

独立阅读

2008 年 10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朱 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成 庆（美国·波士顿）

特约撰稿人：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曾园（昆明）、凌越（广州）、孙骁骥（英国·谢菲尔德）、程明（济南）、马庆（上海）

翻译：陈丹丹（南京）

编者按：

走过一年多的时间，独立阅读也和各位读者一起在不断成长。我们的作者之所以仍然愿意积极地为这份刊物写作，是因为心中还存有一份对精神生活的坚持，而这种坚持，不仅仅是依靠阅读换取什么，而是要让阅读改变我们看世界和看自己的角度。

如果有一天，当你回头看自己的阅读生涯时，还会记得这份微不足道的电子刊物，那将是我们的荣幸，或许这也是阅读的根本意义所在，它让我们的精神联系彼此。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罗四鸽

经 济：苏小和

文 史：王晓渔

艺 术：言 一

音 乐：成 庆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 本：刘 柠

英格兰：孙骁骥

书评

凌 越：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王晓渔：胡风会不会成为周扬？

随笔

严飞：对香港最大的留恋

声音

马慧元：哈罗尔的独奏会

译介

亚当·戈谱尼克：又对了：约翰·斯图加特·密尔的激情（一）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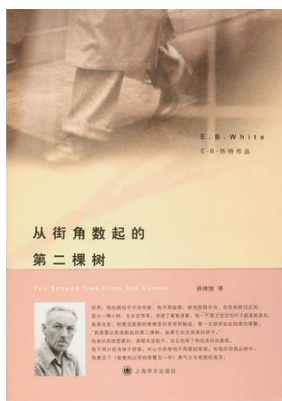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原本我是想,在这份阅读报告的一开始就先议论议论“阅读有何用”,这个话题纠缠我很久了,但事实是纠缠的时间越久,这个问题也就越无法看得透彻。到了此时,已经临近无需议论的地步了。阅读到底有何用,我们的读者自然有自己的看法,我再胡乱罗嗦也没大意思。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不停抖动说不定哪天就报销了的世界里,整天如此“阅读”有劲吗?

尽管阅读看上去意思不大,但是你能告诉我一件胜过此事的事情吗,同样可以打发时间、可以消磨人生的?所以开卷有益还得传承下去。所谓开卷有益是对整体来说的,对个体来说效果就不见得了。我的一个搞医药销售的老同学那天问我,你们写作圈里的,是不是郭敬明最牛逼了?并且说他最近看了两本郭的书。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先是出汗:不好意思,我没敢冒充写作圈里的,这是一;其次对于郭是不是最牛逼的,倒是有很多种说法,以我身边的朋友为例,基本上没把郭当成跟写作有关的人,我再怎么假装谦虚,也不会把郭放在眼里称其为牛逼吧。

说到郭敬明,不是对他有敌意,更没有偏见,更不能因为这三个字而将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打死。比如刚刚出版的岩井俊二小说《华莱士人鱼》(孟海霞译,南海出版社,2008年8月),有郭敬明的推荐,但无论从影迷角度还是小说本身来说,这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拿郭敬明来当噱头卖岩井俊二的书,是一件不值得较真的事情,但这里面的确可能产生误会——大家会不会当成是郭敬明在提携岩井俊二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D版迷的话,就不会没听说过岩井俊二的大名,从迷乱多变的《燕尾蝶》到纯净爱情的《四月物语》,都是这位日本导演留给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关于人鱼的传说和经历,在岩井俊二的笔下魔幻般地展开,也许一个关于人鱼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奇异的鬼才导演用怎样一个方式在纸上讲述这个故事。肯定是爱情,还有梦幻、奇遇、寂寞,这些在岩井的电影中一再张扬过的主题,在小说中是如何完成的呢?需要多说一句的是,日本作家有着一脉相承的细腻感,从川端康成,到村上春树,再到青山七惠,那种对事物尤其人类情感的细腻描写是从未曾间断过的,在岩井的笔下,你也一样能找到这样的传承。



说到传承,欧美作家也做得一样好。比如我们现在流行的一种“高级”新闻调查写作,讲究的是飘逸和优雅,这种语言美感大概就是来源于欧美作家某种一贯的传承。美国随笔作家E·B·怀特作为一个优雅得几乎要飘逸起来的大家,他的文风甚至影响了著名《纽约客》的品质。诗意、柔软,厄普代克称怀特会出其不意地给他的读者“诗意的一拳”,但在我看来,这种十分“文学”的做法力量有限,他只能“击中”,而不是让我们轰然倒下。当然,怀特感兴趣也许不是让人倒下,而正是被这种“诗意的一拳”击中之后,那一脸奇怪的表情。《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孙仲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8月)正是集中展示怀特诗意的一本文集。跟之前出版的《这就是纽约》(贾辉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重游缅甸》(贾辉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有点不同的是,在这部文集里,随笔大师显得更加自信,选入不仅那些传世的随笔,还有他的小说、诗歌。基本上还是那句老话,喜欢的会继续喜欢,不喜欢的会更加不喜欢,因为这里同时暴露了一个人的最大优点和缺陷。

我们作为个体,不可能没有缺陷,反映在书本上,就成了个性或者视角的不同。比如学者崔卫平,一直以来以影评人著称,她的书也大多是影评类,但此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就是文化工作者,她对此的传播作用在我看来远远大于她写的那些影评。对于她的新书《我们时代的叙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9月)来说就是一本针对电影没什么,但却是针对作者所一直关注的“学术”保持效用的书。看崔卫平的影评,不觉得针对电影她提出了什么过人的真知灼见,倒是容易让人看出她的知识偏好和兴趣范围。崔卫平的影评,可以说是从电影内部出发,进而发现她所能观察和体会到的“意义”,用她的话说“对于电影制作幕后的八卦知道得越少越好”。即便不提这种解读容易导致桑塔格所说的“过度阐释”,崔卫平这种针

对文本的阐释也容易造成画地为牢的局面，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样——这是一篇跟导演和其他观众都没什么关系的影评，只是影评人的一篇文章而已。我觉得看这本崔卫平的影评集，重要不是发现一部电影的某种解读方式，或者是电影艺术的发展方向，而是通过崔卫平的文字，我们可以重温或者见识一下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应该关注和理解、知道的那些常识。几年前在南京，有人拿着她翻译的一本米奇尼克的著作《通往公民社会》帮忙出售，可以看出来崔卫平默默地做着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那些事，这些事在今天、明天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掌握和理解什么知识道理，而是很简单很原始的那种猎奇和好奇心，人们对那些陌生的、奇怪的、异议的事物好奇是天性使然。比如，我们看到一种描写人类困境的小说，可以身临其境地感触和想像，并不一定是对主人公面对困境的煎熬有快感，也不一定是要学习别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格拉齐娅·黛莱达的《邪恶之路》（黄文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正是这样一部可以让读者体悟困境的小说。人类没有因为科学进步或者时代发展而减少困境，从这个角度讲，现在的我们和几千前的人们一样，只要是活着就难免遇到一个个困境。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娅·黛莱达，在她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代表作《邪恶之路》里，也讲述了一种困境，一个在爱情上遇到障碍，进而走上一条不归路的男青年，他选择了一条邪恶之路，但在作家轻逸的笔下，他又是那么可怜。男青年彼特罗一生中没做错什么错事，但却遭到爱人的背叛，只有世俗下的解释：门第悬殊，可在彼特罗看来这不构成一个自己遭受背叛的说法。那么，年轻人要自己寻找一个信得过的说法了。毫无疑问，邪恶的选择，是人类共同背弃的，但在主人公这种困境之下，你能为之找到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当我们将目光过久地停留在国外作家身上时，总会有一些莫名的不高兴，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关注自己人的作品，可是很遗憾，这样的愿望大多时候会落空。有一个即成现实是，目前中国作家没有针对当代社会发言的能力！他们只会躲闪、抖机灵。所以，隔洋兴叹成为了一个矫情的状态。有时候这是一个悖论，刻意回避一个时代会成为怯懦者；关注、进入一个时代，则很快会成为过时的和被遗忘者。比如说北岛，个人觉得他的诗只对那个时代有效，如今再来读《结局或开始·北岛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这种诗集，已经完全失效，它对诗歌这种艺术来说是一种局限和限制。刚刚颁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没有降临在这位诗人身上，惋惜同时，也会慨叹时代的印记是多么容易让人遗忘。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罗四鴒（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让水从一个鼻孔灌入，再从另一个鼻孔流出”，这是日本瑜伽天后千丽叶子三次西去到瑜伽圣地瑞诗凯诗（Rishkesh）学到的正宗的瑜伽技法之一。对于瑜伽，我没有太多的热情，她的《优雅瑜伽》（丁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吸引我的地方也不是她学到的正宗瑜伽技法，而是她的瑜伽故事和瑜伽生活，以及她的一句话：“即便很软弱也没关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而生于1980年的台湾青年谢旺霖，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寻找自己的生活：从云南丽江出发，骑单车翻越滇藏边界，抵达拉萨。在这段独自漂泊的日子中，谢旺霖不停与自己对话，流浪，对他来说，只是为了坚持用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若是从前，哪怕是一年前，看到谢旺霖的《转山：边境流浪者》（远流出版社，2008年1月），我肯定会血脉贲张、气吞如虎，痛饮狂歌之后背上行囊，在未老之前远行，在高原雪山之中享受孤独的盛宴，在爬山涉水中感受漂泊的极致，或如马骅一样在梅里雪山下做一名偷睡的汉子……或许是老了，如今的我再也不想像曾经那样，独自坐上一天一夜的火车，再登上满是异乡人的大巴，在暴风雪中翻过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两天两夜昏睡在一个冰凉的硬板床不停地呕吐，在最终如偿所愿



看到最后一抹彩霞下的贡嘎群峰、阳光下盛开的格桑花、寂静深夜中随风摇动的佛铃以及生死轮回中的虔诚与善良后，却依然不知所措……

不过，我仍愿意推荐《转山：边境流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因为除了能间接体验到这个年代的流浪与漂泊的滋味外，还能在作者第二人称的叙述中，与思考的他一起与流浪的他对话，一起感悟，这对于有些麻木纷乱迷茫的人来说，不啻于是一剂清醒剂，而书中“那未能写出的、道出的，永远都比写出道出的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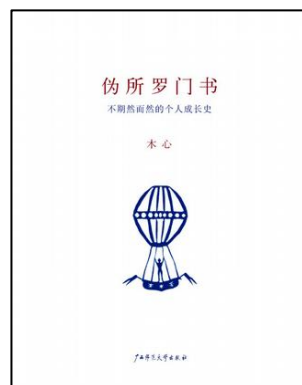
像谢旺霖那样出去看看世界，或许只是极少数人可以承担的奢侈，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徒有羡鱼情”。不过，正如马拉美所说，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部书，因而，对于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走进一个夜晚的书斋，漫步在故纸新书中，心骛八极，神游万仞，不失为一个更好的看世界的选择。在混沌的欢乐的夜晚，捧着阿尔贝托·曼古埃尔的《夜晚的书斋》（杨传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7 月），看着这位骨灰级书虫坐在他精心修建在法国乡村的书斋中，不厌其烦地得意地历数自己的藏书，从古埃及、希腊、罗马到阿拉伯世界、中国再到国际互联网的“全套”图书，从已消失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诗人兼建筑家米开朗基罗的纪念碑式的图书馆到慈善家卡内基建立的图书馆、监狱里囚犯的口头“回忆图书馆”再到狄更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家的书斋，古今中外、纵横捭阖之风犹追其那本“永远没有终结”的《阅读史》（[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5 月），既享读书之乐，又得藏书之趣，让书虫们生发出的艳羡之情恐怕远胜于对谢旺霖边境流浪的向往。而其中，让书虫们时不时为之会心莞尔的是这位嗜书瘾君子的种种痴状：“我想象中的书架，矮的一格从我的腰部开始，逐渐升高到我伸出手臂用手指够得上为止。根据我的经验，书籍如果高到需要用梯子的程度或者低到强迫读者趴在地板上才看得清楚，那就无法取得人们的注意了”。而为了让书架上的书整齐好看，曼古埃尔还给个子矮的书一一装上“高跟”，还总抱怨永远狭小的书架空间……这让人不由得根据汤姆·拉伯在那本妙趣横生的《嗜书瘾君子》（陈建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中描述的种种瘾君子的症状和类型，对曼古埃尔这位无药可救的瘾君子进行诊断。

在《阅读史》中，曼古埃尔描述了圣奥古斯丁默读的形象来叙述以朗诵为主要阅读形式的时期，其实，诵读这种阅读形式更容易让人联想起为晚年失明的博尔赫斯诵读的少年曼古埃尔。1965 年，在一家书店打工的 18 岁的曼古埃尔遇到一位奇怪的顾客：失明的博尔赫斯在母亲的陪伴下走进书店，“把书拿起来碰着自己的脸仿佛鼻子能吸入再也看不见的文字”。而后的许多个夜晚，这位少年为这位失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图书馆馆长读了斯蒂文森、吉卜林、但丁的各种注释版本等等。自此，曼古埃尔的生命中就有了博尔赫斯的影子：无论是读书藏书，还是写作翻译，都可以发现博尔赫斯的影子，他所写的有关博尔赫斯的文字似乎也更具权威性。不过，千万别上当，他的《恋爱中的博尔赫斯》（王海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中的这个博尔赫斯，更像一个幌子，书的主角不是博尔赫斯，而是作为小说家、评论家的曼古埃尔，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身份来与读者分享其在自己书斋中的私人阅读。

10 月若没有肾结石的苦恼，不妨学曼古埃尔那样顿悟下，“不再需要去住在我不愿意住的地方，不再需要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不再需要去扮演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了，巨大、无穷而浮华的场面已经彻底将我摒除在外了。”然后走进自己的书斋开始阅读，当然不一定非要是晚上，毕竟熬夜对身体不好。

2006 年，陈丹青和朱伟的争论让远居美国的木心越发显得神秘，他的文学成就超过了周氏兄弟，或只是一个过时的文化老人？似乎单凭一本《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 月）很难对其做出评价。然而最为尴尬的是，木心所受到的关注似乎只局限在陈朱之争的对象，而没有延及其作品，其随后出版的《琼美卡随想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 年 6 月）、《温莎墓园日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 年 6 月）、《即兴判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 年 9 月）、《西班牙三棵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 年 9 月）、《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7 年 1 月）、《鱼丽之宴》（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素履之往》（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年 1 月）等诗文集，与硝烟未散的轰轰烈烈的陈朱之争相比，可以说是悄无声息。因此，在书店看到其新推出的诗集《伪所罗门书》和《巴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 年 9 月）门可罗雀的情形时，不禁有几分尴尬和好奇。记得曾在

一篇报道中看到，诗集《伪所罗门书》一直被木心视为至宝，在从美国回到阔别 60 年的中国的飞机上，老先生一直紧紧地



将诗集搂在怀里，一直等下了飞机才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安全了。”诗集的副标题是“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惭愧的是，我对现代白话诗一窍不通，当然不能期待在其中找到不期然而然的发现。只记得在备受作家陈村推崇的长文《上海赋》中，木心在写上海的亭子间时说：“也许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因而，我对木心的印象也就只停留在此：比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还要上海人的上海人，虽然他乌镇的故居与茅盾故居在同一条街上。

不过，我却在两个非科班的年轻女学者的书中有着不期然而然的发现。

夹缬和永昆是温州的两大文化遗产。前者是中国古老的服装印染技艺，唐代的夹缬曾经是皇室赠送外宾的国礼，元明后，夹缬仅以单色——蓝夹缬传世，且仅在温州地区保存下来，最好的染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板蓝根。后者永昆则是昆曲的唱腔来源之一。两者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感觉呢？张琴在放弃记者工作后，用了5年时间对民间蓝花布工艺进行收集和研



究，再现了这种奇妙的结合。打开《蓝花布上的昆曲》（张琴著，三联出版社，2008年9月），看到《白兔记》、《杀狗记》、《柳毅传书》、《西厢记》、《金瓶梅》等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被民间织女编织成一片片艳情而又凶险的图案，最为原始也最为生动地呈现在乡间新嫁娘的双纱蓝花靛青被面上，那种吃惊和发现，如作者所说，民间的达观和偶尔的不禁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甚至蓝花布上的昆曲图案也只是民间生活的一个存照，真正的民间生活或许更加生龙活虎，百无禁忌，远远超出新嫁娘的蓝花布所能传达的。



与来自乡土民间濒临灭绝的蓝花布相反，另一个不期然的发现却来自于网络民间最新出现的同人世界。第一眼看到王铮的《同人的世界——对一种网络小众文化的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玫瑰色的封面和陌生的名词让我犯嘀咕，仔细看后才明白，这也是一本有趣的学术书。所谓“同人”，是一些爱好者基于原作和原型所进行的一种再创作活动。书中介绍，虽然与数以亿计的网民相比，“同人”是一种小众文化现象，但实际上，如今大陆地区有数以千计的同人站点，有上百万的同人参与者，创作出了几十万项各种同人作品，每年在全国各大城市定期举行“同人祭（聚会）”，交流销售以书籍为主的各种同人产品。而这本书，就是研究中国大陆“同人”现象的专著，作者本人17岁起就参与同人活动，创作过大量同人作品，出版过同人志，而其真正的专业却是化学。这让连“同人”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我，不由得爆汗，猛翻书狠补课，一边看着作者认真地分析“同人”们“爱”与“萌”的心理，严肃地阐释“同人圈”的活动规则和模式以及各种潜规则，一边不断地期望在认识的朋友中找到一个同人，虽然最后仍有些疑心作者是否小题大做，但不得不信服，确实有一个隐蔽的同人世界在网络上活跃，有更多的不为所知的人在用自己独特方式隐蔽地生活。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尽管全球金融系统风声鹤唳，我却在一门心思阅读《剑桥美国经济史》（[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这部红色而且磅礴的大部头著作，从美国的殖民地时代，一直讲到1981年至1992年里根的革命。这绵延几个世纪的经济史话，让我看到这个伟大的国家一直在朝着自由经济的深处行走，但却也一直追求某种理性的选择，而这样的理性，既有美国人的经济人理性，同样我们也看到无所不在的政府理性。我想起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出手救市的局面，当时真的以为自由经济可能正面临危机。过了几天，我看到布什说，美国政府不是接管金融企业，他们只是救援，忽然明白这可能是整个美国经济史最核心的方法论。

“20世纪的（美国经济）历史表明，美国人只会在面临国家紧急事件的时候才会选择重新开始扩张公共部门。而在紧急事件期间，他们需要的是符合共和理想的税收改革，恢复国家奠基人所追求的效率与公平相平衡的税收改革”。（第三卷

765 页)

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如果说美国自由经济非常强大，那么他们的政府管治经济的能力可能也是一样强大，二者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冲突的关系。美国人不会因为政府管治，就缩小市场，强化垄断，也不会因为扩大市场，就完全放弃政府的管理。如同美国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危机一样，他们的政府同样也经历了多次主动的对经济的管治。今天的布什出手救市，在美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样聪明的国家经济学方法让我们视野顿开，也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的经济格局的局促。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无所不在的二元思维将很多人固定在某种简单的对立情绪中，比如自由竞争与政府管理的简单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对立，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简单对立。以为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以为我们永远找不到共谋与共赢。我知道现在有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人对美国金融危机幸灾乐祸。那么多银行倒闭，那么多美国人还不起按揭贷款，他们的房子一夜之间成了鸡肋，好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政府终于憋不住，开始站出来救市了。此情此景，的确能满足部分国人积攒多年的压抑情绪，帝国主义终于开始崩盘了，资本主义出现了巨大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出现了实证性的谬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开始出现，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人们开始怀念早已被历史否定的重商主义，或者是沉默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相信更多的中国人现在更加认为，只有依靠政府的强力管制，我们的经济才有希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终于找到发展经济的密码了。

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暂时看上去的确不错，虽然外汇储备系统在某些细节操作上可能有所亏欠，虽然我们的金融管理可能依然漏洞百出，但人民对此完全不知情，因此这样的影响看上去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宏大的风景如奥运成功举办、宇航员太空行走等等成就就不说了，看看我们的银行，他们依然在按部就班，这种稳健的风景让我们的储蓄看上去很安全；我们的保险公司还是那么有活力，那么多保险代理人还在大街小巷展业，公司的保费规模还在继续增长；只有资本市场差一些，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走入熊市已经很久了，它本来就与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关联度不大。

这就是我们的局面，外面风起云涌，里面安之若素。中国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座半开放的岛屿，它有一座宽阔的桥梁让别人进来，也可以沿着大桥有选择性的走出去，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由此构成了一种理性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人民币一直不能自由兑换，但国家却可以长时间大规模的持有美元储备；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一直属于国有垄断，外资银行和本土民间银行必须受到限制；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最核心的资源，这导致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政府意志的操控，30 年来，虽然我们的市场自由竞争水平进步不错，但政府看得见的手才是我们这些年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可以肯定地认为，可能正是这种依靠政府推动的半开半合经济，才让我们没有大面积跌进全球金融风暴的漩涡之中。所谓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确有理由找到更多的自信。不过有些深层次的经济现象需要提醒：尽管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一片楚歌，但这些问题仍然只是一些金融技术层面的问题，可能是监管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可能是金融衍生品过于技术化，还可能是信用体系过于透支，导致人们对未来的金融发展失去了必要的信心等等，但从整体看，今日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制造业还是那么强劲，他们的创新能力依然如火如荼，他们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还在攀升之中。某种意义上，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回头看我们自己，问题似乎刚好是反向的。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看上去是比较安全，但我们的制造业却已经处在一种巨大的危机之中。多年形成的出口依赖性企业模式遇到了大麻烦，随着出口订单的减少，或者随着外资和民间资金的萎缩，大批的中小企业出现了停产甚至是倒闭。拉动内需的理论再一次被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可是扪心自问，一个伟大的内需市场怎么可能短期内形成？

这样的态势必然要影响到我们热爱的 GDP。是的，随着 GDP 的下滑，我们的经济的确将要迎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它可能不是现在，但应该不会太远，所以有学者就站出来了，中国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可能是在年底，或者明年，中国企业的冬天应该不远了。

有一个常识需要在这里重复：当政府力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手之后，市场的容量必然持续萎缩，人们的创新能力必然滞后，企业的竞争水平必然下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企业都将渐渐演变成成为政府的食客，市场中所有的元素都将只是围绕政府意志运行。这几乎是“大政府、小市场”模式的必然归宿，类似于大海里的鲸鱼，它孔武有力，在海洋里穿行，而更多的小鱼、浮游生物则紧紧黏附在它的身体上。显然，这样的生态链是不健康的，一旦鲸鱼出现危机，整个生物链就可能崩溃。



很有可能,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史都将仍然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有价值的参照系,不仅是增量意义上的发展,还包括经济增长和道德建设的逻辑关系。我的手头就有这样一本书,本杰明·M·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李天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每个有思辨能力的人都会提问,我们那么明确地积极的关注经济增长,是否就是绝对正确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里德曼开始超越他的经济学工具,用民主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范式来进行思考,从而试图展示经济收入的提高应该怎样使得一个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具有道德感。

弗里德曼有一个很醒目的认定,单纯的富裕并不能保护一个社会免于倒退到刚性与不容忍的状态。他的立意非常让人激动,因为他的所有陈述,都来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思辨传统。这是一种经济增长和道德增长的关系与过程,它显然应该发生在经济增长的某个理性阶段,而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却让我们沮丧,似乎看到了太多的经济增长,但道德水准却反向而动,以至于我们对单向度的经济增长几乎就要失去兴趣和信心。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当然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简单的判断,当然是人和组织对经济增长的迷恋,让人失去了道德尺度,人性的罪恶让我们无恶不作。不过后来我不太满足于这样的简单批判,我开始沿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性角度来分析。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一个熟悉三聚氰胺的化学专家,发现是牛奶企业核心技术的不足促使他们寻找蛋白质的替代品,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中国企业发展30年之后,一个最让人沮丧的局面就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不关注核心技术,都不关注技术性的创新,而只是关注短期的规模与利润,这导致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竞争能力,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山寨现象,所谓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现象。事实上,将三聚氰胺注入到牛奶中,就是一种山寨牛奶。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道德精神的缺失已经蔓延到中国当下所有的企业,所以,温家宝才说出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但是,真正的道德精神不是依靠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训斥就能够建立起来的,弗里德曼的阐释让我们更加坚信这一点。

在道德意义被提出之后,我愿意提及一个更加抽象的主题,这就是我们对经济的信心。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现实经济,而可能有巨量的未来经济在当下展开,信心的价值由此凸显,由此,我们才说,在这样的时刻,信心比黄金还要宝贵。

是的,信心成为这个世界上经济继续前行的主要动力之一,类似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当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大名鼎鼎的AIG也沦落到需要政府施加援手,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让太多的人们回不过神来。世界真的出了问题,我们本是相信这个世界的,相信在万物生长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期许的金融体系让我们丰衣足食。如同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空气、阳光和雨水,相信神总是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即使灾难来临,上帝对我们始终不离不弃。

是的,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上帝自有他的美意。就像刚刚过去的9月,财大气粗的美林集团竟然作鸟兽散,成了美国银行的盘中餐。肯定是上帝导演了这场收购游戏,在此之前,人们心目中的美林一直是多么高涨啊。可是《华尔街日报》却带来了美林种种不详的消息,他们说美林集团是在美联储的压力下被迫出售的,因为他们担心美林证券会步雷曼兄弟的后尘。在过去的15个月中,美林集团的资产负债表上拥有数百亿美元的高风险、流动性不良的资产,负债权益比率超过了20倍。2007年年中信贷危机袭来之时,这些资产价值一路下滑,难以轻易售出,严重影响其缓冲资本。



真的是无法想象美林集团能有今天。纯粹从金融技术的层面看,那可是一帮骄傲到极点的家伙,曾几何时,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全部属于他们,上帝本来是要他们当财富的管家,但慢慢地,他们开始越过上帝,直接操控财富了。上帝说了,我们对他的敬畏必须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上,所谓因信称义,没有了信,上帝不高兴,没有了信,我们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美林的遭遇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但也不是第一个。我想起瑞士联合银行和瑞银集团之间的并购大战。其中的细节精彩纷呈,瑞士的迪尔克·许茨著作《上帝导演的并购:从瑞士联合银行到瑞银集团》(李欣婕、曹煜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4月)耐心的将他们记录在案。迪尔克的工作就是从信心出发的,他和这场并购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无数次的谈话,感受到了一种迄今为止从未在大企业里感受到的痛苦滋味。今天那些在异地漂泊的前瑞士联合银行的职员们,后来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所以他们愿意说出真相,愿意把曾经不可一世的瑞士联合银



行的种种内幕公布于众。迪尔克由此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瑞士联合银行内部的士气早就低落到了极点，他们集体性的不相信瑞士联合银行还能走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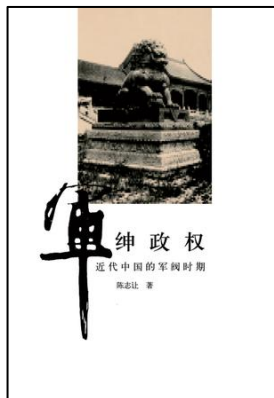
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银行并购事件却能让我们看到最本质的问题。对经济的信心，构成了这个世界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动力。一切都从信心出发，如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注定是过客，只有坚定仰望的人才能抵达永恒。伟大的金融世界何尝都不是这样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心才构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金融体系。成功源于此，失败当然也源于此。今天的美林集团、雷曼兄弟如此，早些年瑞士联合银行也是如此。舍弃了这样的信念，我们一生的劳碌将化为乌有。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在去书店的路上，读到《南方周末》（2008 年 10 月 9 日）节选的《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 年 10 月）：杨绛和钱锺书初次碰面之后，钱锺书立即表明自己并非传说中的叶恭绰的未来女婿，杨绛也表明自己并非传说中的费孝通的女朋友，自此开始 60 余年的相濡以沫；“洗澡”期间，为了避免麻烦，朋友道路以目，杨业治走过杨绛，自说自话地念叨两遍“Animal Farm”，杨绛立即意会。江湖上有一则流传已久的钱锺书语录“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虽然杨绛、李赋宁都曾否认这段语录，许渊冲却认为“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钱锺书与叶家化玉帛为口舌，不知是否跟叶家认为钱锺书狂妄、骄傲有关。“Animal Farm”（《动物庄园》）的典故，让人想起另一位翻译家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里提到当年燕京大学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先生感慨：“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报上说这本书“即将推出”，到了书店，意外地发现《听杨绛谈往事》已经摆在显著位置，立即拿下，回头用了两三天时间读完。这本书在编撰上的问题暂且不谈，作为杨绛唯一授权的传记，它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比其他传记难以替代的。杨绛在上海中西女校、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工部局小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借读、陪读、执教和研究经历，几乎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剪影。其中很多细节更是独家报道，比如里面提到“新中国”刚刚成立，钱锺书和杨绛初到清华，因为杨绛对政治冷漠，钱伟长曾当面对费孝通说：“咱们来改造她！”这让我想起，30 多年后，刘宾雁等准备发起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钱伟长、费孝通等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两人的积极上进是有“前科”的。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8 月）终于再版，三联书店曾于 1980 年引进。近代中国，我最感兴趣的是 1898 至 1928 年，从帝国到民国再到党国，三十年三种国家图景，依次展现。可惜关于这一段，至今暧昧未明，陈志让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 1860 至 1895 年是绅—军政权，1895 至 1949 年是军—绅政权，这两种政权阻挠了中国的现代化。对于这个说法，我持保留意见，陈志让讲到现代化，比较注重日、德、俄的经验，在我看来，这三国的经验不足以成为示范。陈志让在全书结尾提出“中国真正计划的现代化的工作是在 1949 年才真正开始”，更是不知所云，他没有给出理由，我不清楚这个结论从何讲起，也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是大陆还是台湾。相对他的一些结论，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些具体论述，《军绅政权》重点讨论的是 1912 至 1928 年，陈志让认为传统政治的标准是有道无道，现代政治的标准是合法违法，中国拥有宪法之后的矛盾常常是法和道的矛盾，比如袁世凯任命江西民政长，江西都督李烈钧反对，袁世凯的任命是合法的，但李烈钧认为袁无道，“护法的人要护法，卫道的人要卫道”，纷争不断，公众从向往法治转为怀疑法治。这种论述清晰地呈现了当年的内在冲突，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把这一段时期的混乱的原因归因于宪法的制定。对于 1912 至 1928 年，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同批判，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7 月), 引起读书界的关注, 但他自我戏剧化的记忆也遭到不少质疑。相比之下, 译者回应批评的文章《关于〈民国采访战〉的翻译问题》(《东方早报》2008 年 9 月 13 日),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种不愠不火的文风非常难得。《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的回忆录《在中国二十五年》(尹雪曼等译, 黄山书社, 2008 年 9 月) 少有人关注, 恐怕跟《密勒氏评论报》的知名度有关。不过, 这份报纸虽然是作坊式的, 在 20 世纪中国却有着它的独特位置, 因为《西行漫记》的片段就是由它刊出。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鲍惠尔作为亲历者记述的“蓝钢皮”事件, 也就是著名的临城劫车案, 被劫的火车是当时东方仅有的全钢火车。鲍惠尔的记述如同小说, 细节生动, 可以直接还原成纪录片, 生动得让人怀疑其中是否有虚构成分。在台湾未能刊载的部分此次补上, 但书中又增添了很多省略号, 只能靠想象力来填补。更有趣的是“译者前记”和“编后记”, 前者是 2008 年刚刚去世的尹雪曼所写, 他认为鲍惠尔的儿子小鲍惠尔是个左倾幼稚病患者, 言论受到共产党影响, 以为那样可以获得共产党的赏识, 但《密勒氏评论报》仍然逃不掉关门的命运, 最终小鲍惠尔“不得不夹起尾巴, 狼狽地逃回美国”, 具体姓名不详的编者则认为小鲍惠尔因为如实报道中国和朝鲜战争的真实情况, 并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端迫害。我不太喜欢“夹起尾巴”这种句式, 也不敢断定小鲍惠尔的报道就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两个版本的不同删节和两地编译者的不同论述, 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不容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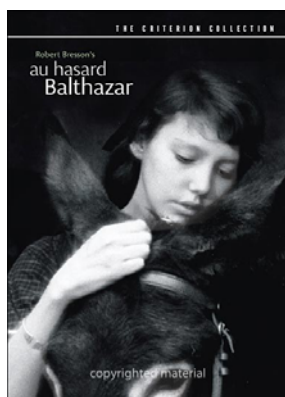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编的《启迪: 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 三联书店, 2008 年 9 月), 早在 1998 年就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 我一直不明白, 为何这本毫不敏感的书迟迟未能进入大陆, 如果当年能够同步出版, 它所引起的反响肯定超过今日。如今, 书中所收文章大都通过各种方式有所阅读, 已经难以再次带来“震惊”。



ARTS 艺术

观察员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在 cc 版的《巴尔塔扎尔的遭遇》里, 有一段对布列松(Bresson)的采访, 他对 cinema 和 cinematography 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认为后者才是自己一直所专注的事情, 才是一门艺术, 而前者容易流于肤浅的娱乐。他进而补充道: 近些年来, 电影艺术有着下滑的趋势。而这一下滑部分是因为收音机, 电视这样一些媒体的大行其道所造成的, 尽管在另一方面收音机和电视也帮助了电影艺术的传播。



在这样的一段观点的表述当中, 布列松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如巴赞, 巴拉兹等人的观点, 彻底的将戏剧性以及戏剧性紧密相连的表演从电影中剥离出来。在他的电影当中, 戏剧性和表演都不再是拍摄的核心, 而是可有可无的。真正重要的是镜头与镜头, 画面与画面之间的关系, 是图像语言与音乐语言的交汇, 以及在交汇之后发生的转换。在转换当中, 艺术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我想, 这大概是他为什么会被冠以结构主义之名的原因。

结构与形式往往形影不离。可是就像施拉德说的那样: 形式对于布列松而言, 是一种艺术的风格, 是刻意为之。但这不同于为形式而形式的做法, 亦不同于把形式当作核心理念。于是你会发现在电影中, 布列松刻意地省略掉许多在理论上和习惯上需要被拍摄的情节, 台词, 以及表演。他似乎刻意地和观众的观看习惯过不去, 把电影最擅长打动人的动作场面和特写镜头都当作不必要的东西略去。但归根结底却是为了避免那些属于戏剧的, 流于肤浅的观影快感。也正是凭着这样的坚持, 布列松才从真正意义上截断了戏剧和电影之间具有长久渊源的联系, 锻造出一种更为纯粹的被他称为 cinematography 的艺术。

在布列松的这样一种追求当中, 你可以发现他对于一种真实的执着, 也能发现他对于精神层面或者说对于灵魂归宿的拷问。这样的一些东西似乎注定只能用节制, 用沉默, 用省略营造出的想象空间来传递。从而, 它不可能是饱满的, 不可能如

当下的电影般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和华丽的场面。在这一点上，写出了《美国精神的封闭》的布鲁姆与布列松似乎心有戚戚。在他看来，摇滚乐最大的危害并不在于它可能带来暴力，色情，而在于它所可能导致的廉价的感官体验摧毁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无法把人的动物性和精神性连结在一起，无法同艺术和思想建立热情洋溢的联系。而收音机和电视亦是以廉价的娱乐破坏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凶手。

只有高潮，没有喜悦

记不起是谁说过：只有高潮，没有喜悦。在我看来，这似乎很能概括我对最近一些演出的感想。在巫师的演出现场，竟是差一点睡着了。很难想象，这竟是一支我一度十分喜欢的乐队。犹记得在 05 年小酒馆的新年摇滚音乐会上，这支叫做巫师来了的乐队在凌晨 2 点登场，令我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 Chinese 的 big band 么？当时的巫师有近十人，主唱一把木吉他，传统摇滚三大件，更有二胡，古筝来助阵，由于借鉴了东北二人转，还有两个声线很靓的 female vocal，在旋律当中穿梭自如。这样的音乐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让人十分享受，而音乐本身由于融入了不少地方戏曲和传统乐器而带有明显的中国底色。原本以为巫师会沿着这条融合之路继续走下去，但事实却总是事与愿违。

也许是由于中国没有 big band 的传统(这一说法有待斟酌)，又或者是十人组编曲太过繁复，再加上传统民谣的采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巫师最后所选择的，是一条走向精细，力量的道路。坦白地说，眼下的巫师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台风上都要比三年前的巫师好很多，这说明在这三年里他们并非是在退步，喜欢他们的乐迷也越来越多。可是在音乐的创作上，却让我感到他们过分地依赖于技术，依赖于用力量和一些形式上的噱头(部分体现在歌词上)来吸引听众。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在我听来却恰恰是最没有力量和最为苍白的。他们的根已不再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土壤里吸取养分，尽管看上去还扎入在其中。从而，他们的音乐也再无法带给我新意，带来那些他们曾带来过的鲜活的东西；于是，我的身体也就只能选择沉睡。



好的音乐不应当仅仅让你的身体感到激动或者兴奋，它更应当使你沉醉，愿意沉溺其中而不自拔。MONOKINO 的音乐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对于我而言是如此。MONOKINO 是一支具有多国背景的乐队，主唱兼吉他 George 和鼓手 Frans 来自荷兰，键盘手虞静(前眼镜蛇乐队成员)却是生活在德国。这样的一种遇见是需要缘分的；而他们的音乐则完全没有辜负这样一种缘分。尽管乍听之下，他们的音乐里充溢着跳跃的电子音符，旋律也颇有几分 pop 的味道，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音乐显得单薄或是流于肤浅。鼓手 Frans 巧妙地将机械鼓和原音鼓融合在一起；虞静指间的键盘随时可以游刃有余地扮演起贝斯的角色；主唱 George 手中的吉他不时刷出尖锐而狂暴的音墙，再加上他那把颇似 placebo 的嗓子——这一切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比肩当下优秀的英伦乐队或者后摇组合。只是，他们却最终将编曲的天平倾向了电音。他们选择让虞静手下的键盘与合成器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完成五彩斑斓的布景；然后由 George 如同一个游吟诗人一般，在 Frans 鼓点的引领之下踩着手中吉他的旋律在梦境中奔跑，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着一一种内敛而沉稳的气质，这使得他们可以在抵达疯狂的边缘之后还能轻易退回到古典的温暖与静谧。我，如此沉醉。

今年早些时候便知道：成都人开始以一种很“地上”的方式在做小剧场话剧。记得，声势做的不错，但第一次的演出却由于日程不对终究没能去看。于是，对更有经验的第二次演出也就更多了些期望。孰料，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面对这样一出号称成都首部的多媒体爱情喜剧，我所能给出的评分却不得不位于及格线以下。

对于成都这样一座城市而言，话剧，或者说当代话剧，一直以一种幽灵般的状态存活着。在大多数的时候，你无法在公众的视野内见到它，仿佛它只能依附在各大高校的话剧社当中。但它毕竟活着，这么多年来也诞生过不少优秀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其实也就是未能在公共小剧场上演的小剧场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爱情疯人院》远远算不上成都的首部小剧场作品。

进行上述的回溯，绝非是意在论资排辈。表达的真正关键，还是在于它可以提醒我们，已然有多少积累下的经验在等待着我们去吸取。然而，这部和自由演绎话剧俱乐部合作推出的作品，恰恰没有能从自由演绎过去十多年的话剧演出中吸取一些它应当吸取的东西。难道这是因为主创人员都只顾着去创新了么？可是如果只是幻灯片加上音效加上优酷网的视频背景就算多媒体创新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有人过于低估了网络时代人们的审美水平。

回到话剧本身。一开场的布景让人眼前一亮，不过我却有几分担心：演员的表演能否将布景的力量发挥到应有的水准。男主角的出场让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在一瞬间便把之前的美好印象全都毁去。无论是他的个人形象(服装)还是念白都糟到了一定的地步。随着情节的推进，我更是不停地暗自琢磨：导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气质和演技都不太合适的人来出演男主角呢？这一疑问在散场时候终于得到了解答：男主角就是导演本人。这一发现令我气结。(后来得知，导演是因主演在公演前离队，而临时顶上的。虽然可以理解苦衷，但给观众的效果却无法改变。并且也揭示出更多的问题——演员的管理。)

表演系出身的导演把每一句台词都念得字正腔圆，在情绪爆发时也充满力量。你能感觉到其中的努力，却依然无法被打动。因为这样的情绪爆发基本没有铺垫，没有剧情的支持，就像是为爆发而爆发。观众对这样的表演并不认同，并不相信，自然也无法共鸣。更糟糕的还在于某些片段的音乐在响起时就已经把情绪渲染到一定的程度，但接下来的表演却达不到相同的高度，令人颇有欲求不满之感。在我看来，这些片段如果更多的采用肢体语言甚至是舞蹈来表现，效果会好很多。

同样令人纳闷的事情还包括：为什么导演会选择这样一个剧本来作为自己的首部小剧场作品？自《恋爱的犀牛》之后，国内的先锋剧剧本可谓层出不穷，其中亦不乏优秀之作，比起眼前这部大词漫天飞，只在形式上玩一把先锋的剧本不知好上多少。可是为什么是这本《爱情疯人院》呢？朋友说：可能是为了市场吧。只有爱情，才是大众容易产生兴趣的话题，也才会想去看相关的表演。

成都的话剧其实从来都不缺乏优秀的演员，至少这部《爱情疯人院》里的四个配角就显得十分出彩。真正薄弱的环节，恐怕还是在于剧本，尤其是那些原创的，关乎于成都生活的剧本。而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一种薄弱在短时间内无法缓解的。因为无论是成都还是别的城市似乎都不具备产生优秀剧本的社会土壤。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回到那些古老而经典的剧本，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从理解剧本和表演训练开始呢？

这是一个古典之崇高被遗忘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节制被嘲笑为保守的时代。既然我们对那源自内心的涓涓喜悦被肤浅的汹涌高潮彻底取代感到毫不在意，那么我们也无须讶异于竟有那么多的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喝下了那些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一切，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不是吗？



MUSIC 音乐

观察员 成庆 (美国·波士顿, veron.cq@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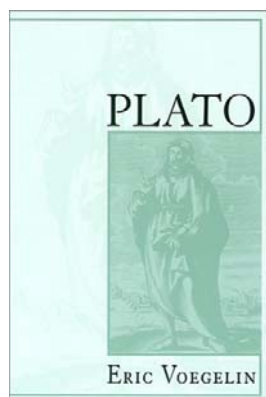
《独立阅读报告》已经迈过一年多的时光，笔者作为这份电子期刊的发起人之一，本是想与几位朋友作一些聊以自慰的工作，无意将其作为一份可堪经营的事业来打理。我们的初衷，无非是想以个人非常片面的阅读经验，来与那些仍然在思考这个时代基本处境的朋友们分享，毕竟哲学思想方面的阅读除了知识的积累，在我看来，其基本功能在于思考自身的意义纠结，以及勘察现实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因此，笔者这位并非念哲学专业的写作者，也贸然以思想哲学的引介者自居，写了一年多的观察报告，个中错谬之处，恳请读者谅解。

不过，笔者所想要说的并不仅此而已，关于哲学，如今逐渐被垄断为学院内部的知识生产，但我想重点强调的，是有关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每本介绍哲学的入门书都会以此题开篇，但是每当我们读到无数的专业哲学著作时，便会深切体会，“哲学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生产体系里已经基本付之阙如。我们都会被告知，在进入一个研究领域前，首先要作的是熟悉这个领域的所有重要相关文献，接下来就会陷入各种哲学流派的概念与术语之中，如此延伸，这些概念逐渐主导我们的生活，最终让我们成为一个个“理论人”。

但是这样就是哲学吗？哲学的原意不就是事关我们的人生智慧吗？而人生智慧不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样具体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世界符合一个善的原则吗？为什么我们阅读哲学，要以学院的主流趣味作为认识人生的原则？学院人士

难道就比其他人更能通晓智慧在何处？



如果哲学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学科，那么柏拉图是最不专业的哲学家；如果我们只能在现代哲学家的框架下思考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知道，作为个人，最基本的哲学冲动是什么，我们人生意义的阀门深锁何处。因为哲学，从来是关乎个人人心，关乎我们的道德自问，关乎对时代处境的个人感知。任何对这些基本问题来不断发问的人，或许才是真正具备了哲学的爱欲(EROS)。

由此，今日之哲学已然堕落成一种对知识不断积累的迷思当中，以为所谓“哲学”就是关于哲学的知识，并且认为这些知识可以随时代进步而不断积累，这种知识上的乐观主义造成今天四处弥漫的知识控制欲，大家以知识上的斗勇斗狠为主业，以“奥数比赛”模式来看待哲学上的论辩，似乎知晓对方所不知晓的知识，就能真正把握到哲学的真义。

不，这或许是关于很多事物的知识，但是绝非哲学，哲学如果无法落实到我们的人生实践，那么那仅仅是一堆关于万物的见解，因为它和人心是分裂的，苏格拉底的死并不仅仅事关民主政体对哲学家的迫害，它还意味着，只有真正具备哲学的 EROS，才会切实承担如此人生理解的结果。

今日大学里精神的粗鄙化，知识人精神上的猥琐萎靡，本质上在于这些基本的道德自诘已经无处可寻，因此我们可以一面传授关于各种关于哲学的知识，一面却在行种种不义与不仁，无数“学术青年”也会随之起舞，以为学术原本就是我们的进身之阶，道德探讨只是虚伪的清谈。这些最终都归结为，今日哲学已被异化成一种知识的自我生产，我们无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增加任何个人的经验，就能造就出一位哲学专业人士，如此看来，今日的哲学专业（也包括人文学科）本质上是“异化”的。

这些感想无甚高论，只是过往 10 余年思考的个人心得，如果它还聊以成为个人的哲学看法的话，那也只是十分粗糙的思考倾向。但是这种思考，于我而言，事关对生活的切实理解与选择，或许值得与各位朋友共同深思。

从本期开始，我会在这里陆续给各位报告波士顿的古典音乐演出情况，与爱好古典乐的朋友一起分享爱乐经验。有此想法，自然来源于波士顿的丰厚文化资源。就古典音乐而言，这里首先当然有波士顿交响乐团(Boston Symphony Orchester)，还有著名的波士顿巴洛克乐团(Boston Baroque)、美国最古老的音乐组织 Boston Cecilia、波士顿室内乐协会(Boston Chamber Music Society)，以及波士顿最闻名遐迩的早期古乐节(Boston Early music Festival)。除此之外，各种零散的演出也是相当密集，比如每个礼拜五，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都会有世界各地的管风琴演奏者来进行一场小规模免费演出，而 Emmanuel Church 则在每周日的上午 10 点会有巴赫的康塔塔演出，而这一传统至今已 39 年。有如此优良的文化氛围，难怪波士顿会被称为是“美洲的雅典”，可谓名副其实。

不过这里或许有必要简单交代的是，爱乐一事，对于个人而言，本是相当主观的行为。尤其如我等业余爱好者，趣味本具有相当的私人性，无法成为一套普遍的标准。古典音乐是我青春期认识艺术的开端，它曾经给我打开过一扇认识伟大心灵的窗户，给我昭示出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一种提升个人精神“善”的道路。所以这里的许多评判之语，都只是基于笔者特殊的个人经验与趣味，读者不可不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音乐专业人士是否一定垄断对音乐的阐释，或许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认识音乐，在我看来，大抵有三条途径可寻，一是常见的情感。比如喜悦、振奋、阴郁等等，这些感受都可在聆听许多乐曲时直接获得；二是对形式的把握。这无疑体现在对音乐形式的结构、主题及动机等等专业分析方面，这种认识音乐的方式，试图将音乐对人的作用以形式对应的方式进行解释，当然还有极端者更会认为，乐曲形式本身就具备自洽的内在逻辑。这种以理性分析乐曲的模式，是今日音乐学院鉴赏音乐的主流方式，或许也可视为是近代思维“科学化”的一个缩影；第三则是一种直觉的体验。关于这种体验，常会招致音乐专业人士鄙薄，认为这种对音乐的把握不可捉摸，也无法验证，更无法普遍化成一种关于音乐的知识。不过在我爱乐的 14 年路程来看，今日能够对其产生一种生命上的依赖感，正是这种直觉性的体验不断地给我提供内在生命的活力，让我得以体验人性内部的丰富与深度。当然，如果有人能够兼有对音乐技巧与直觉的良好掌握，我想这应该是最为难得的禀赋，而我们在音乐史上所遭遇的这么多音乐巨人，正是如此的典范。



来波士顿前，就有朋友提醒我去办理一张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高校卡”(College Card)，只要花上 25 美金买上这样一张卡，你就可以凭借学生 ID 与这张“高校卡”听到大概 20 场左右的 BSO 演奏。而对于那些 18 岁以下的孩子们，则有更多的优惠，不仅可以花更少的钱听更多的演出，还可以免费参加乐团的一些排练场次。

这样的公益行为当然是为了培养青年一代对于古典音乐的兴趣，据我观察，前来参加音乐会的观众以中老年人为主体，三场听下来，常常举目望去，都是白发苍苍，大多还是正装出席，颇有古雅君子之风。不过我等这样衣着休闲的年轻人，也不乏人在，因此也不觉突兀轻率。对于古典音乐而言，年轻人的缺席未免让人感觉遗憾，不过这种全球化的通俗文化大潮流，已成大势所趋，当 20 世纪的古典音乐大师纷纷告别我们时，我们并不知道，21 世纪对于古典音乐，到底会意味着什么。

拿着“高校卡”，并不意味着你百分之百的能拿到票。按照规定，你必须在开演当天的 10 点到下午 5 点之间去音乐厅的售票处领票，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不过目前看来，去拿学生票的大多是附近 Berklee 音乐学院（这座音乐学院对于国内粉丝们而言，值得雀跃欢呼一下，因为那是王力宏的母校）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C)的学生，因此基本都可以顺利拿到票。而这些也并非垃圾座位，我还拿到过第二档次（如果正常出售，大概需要 70 美金左右）的座位，这在国内，几乎是难以想象。

在波士顿听到的第一场演出，是由普列文(Andre Previn)担任指挥，上半场曲目包括由指挥本人作曲的“猫头鹰”(Owls)，该曲也是世界首演，另外则是与吉尔·沙罕(Gil Shaham)合作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Stravinsky: Violin Concerto in D)，下半场则是贝多芬的第四交响乐(Beethoven: Symphony No. 4 in B-Flat, Opus 60)。

刚刚入场，就被波士顿交响音乐厅的精巧典雅所震撼。这座 1900 年 10 月 15 日落成使用的音乐厅，被誉为是世界上三大音乐厅之一，其余两座则分别是维也纳的金色音乐大厅（Musikverein Goldensaal）与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由于设计精妙，这里的声效广受赞誉，卡拉扬还曾盛赞道，在这里演奏某些曲目甚至要比金色音乐大厅更好。值得说明的是，波士顿音乐厅与金色音乐大厅一样，都采用了“鞋盒”(Shoe Box)的形状，即一个矩形的空间。按照声学专业角度来看，据说这是因为两边的墙壁可以给后排的听众提供足够的反射声频，而墙体所使用的加强石膏板又可以避免吸收声音。曾经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听过一场穆特的演出，初时感觉声音不错，但是后来看到报道，曾有观众反映过后排无法听清大提琴声，才明白东方艺术中心对于象小提琴这样的乐器，可以充分表达其声效，但是对于低频声音，却暴露出很拙劣的声响设计。

走入音乐厅，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舞台的明亮辉煌，舞台上的那架管风琴，据说上面还有著名管风琴演奏家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的签名，而我最近恰好还在阅读他的那部巨著——《巴赫》(J.S. BACH)。大厅的四周上方，依次有 16 尊希腊和罗马塑像，颇有重回雅典之感。而我坐的座椅，依旧还保持着 1900 年的状态，有坊间八卦传说，这些座位已经不大适合今天日益肥胖的美国人的体型，我的旁边就坐有一位“满座”的美国女性，而我这个亚洲人，坐于其中却甚觉宽敞，比起上海音乐厅的逼仄拥挤，要好上许多了。

本以为这场音乐会是由 BSO 的音乐总监列文(James Levine)指挥，拿到本场音乐会的节目册才知，本场担纲的是近 80 高龄的普列文。来波士顿的首场演出，就偶遇名指挥，也算是初次见面的大礼了。

不过普列文出场时，已是步履蹒跚，这位著名小提琴家穆特(Annie Sophie Mutter)的前夫，今日已是耄耋垂老，想起不久前还在上海遭遇过的穆特，未免心中感觉唏嘘。首曲开始，乐曲本身还未有所感受，就已经感觉到眩晕，这种弦乐音色于我而言，只是在聆听慕尼黑爱乐乐团现场演出时才有幸听到，且当时还是最后一排，音色已是大有折扣，如今身在前排，亲耳听到温暖的弦乐起声，颇有热流在胸中翻腾。

“猫头鹰”这部作品其实刚刚完成不久，就由 BSO 拔得头筹，抢在这里首演。仔细聆听下来，仍可感觉普列文背后的德奥音乐传统，旋律上颇为浑厚，而且结构紧凑，并无许多现代作品的冗长混乱，应该说，尽管是现代作品，但是仍然算得上是可听之作。

次曲，则由少年成名的吉尔·沙罕(Gil Shaham)来演奏，这位过往只在音乐手册上看到的名字，今日得见，虽已近四十，





Gil Shaham. Photo credit: Boyd Hagen

但是仍如大龄男孩，脸上始终带着笑容。记得多年前读到他的介绍，这位少年成名的演奏家，10岁就已经与耶路撒冷交响乐团合作展开演奏生涯，而且由于其犹太人的身份，因此也得到斯特恩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助力，并且从以色列回到美国投入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教育家多希·迪蕾（Dorothy Delay）门下，这位加拉米安的女弟子，也不负师望，同样培育出象帕尔曼（Itzhak Perlman）、米岛莉（Midori）、莎拉张（Sarah Chang）、索娜伯格（Nadja Salerno-Sonnenberg）、明茨（Shlomo Mintz）等乐坛名家。而普列文与沙罕的合作，也并非首次，他们在1999年合作出版的《美国景色》专辑就曾获得过格莱美大奖。

说起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我所听甚少，因此也并无任何先入之见。此曲的结构分别是托卡塔、独奏曲 I 与 II，最后则是狂想曲。斯特拉文斯基本身并不大熟悉小提琴，因此当受委托写作这首曲子时，还专门就此去请教欣德米特。沙罕头一个和弦拉出，就让人知道其技巧不俗，因为这支曲子的每个乐章开始，都是以一个颇为怪异的相似和弦开头，要想拉出突然而不突兀的感觉，并不容易。这个曲子并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只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四乐章，可能是沙罕的性格里本身就有一种开朗明快的因素，因此狂想曲颇符合他的演奏气质，时见他不断侧身笑对普列文，一边却是演奏速度紧快的乐句，只是由于我的位置略微偏右，当他不断侧身的时候，琴声颇有此起彼伏的效果，最后带有炫技兴致的结尾，在观众的热情掌声中结束上半场演出。

下半场则是比较常见的“贝四”，说起此曲，实在算不上贝多芬交响作品的名作，比如就拿著名的新格罗夫辞典系列的《贝多芬》一书中，也只看到对第三与第五的详尽分析。按照习见的看法，贝多芬第三交响乐（Eroica）是其交响乐写作的突破之作，而贝五（Fate）这首众人皆知的“命运交响曲”，更是被看作是贝多芬“英雄时代”的代表作。但是这首贝四却显得有点颇为左右为难，一方面它是在贝多芬写作第五交响乐中途时一气呵成的作品，但是其风格却与“命运”大为迥异，透露出一种亮丽明快的色调，加上波士顿交响乐团本身的气质也似乎和此曲颇为合拍，因此经常奏出欢快的画面感。而最近我听的另外一个切利比达克的慕尼黑爱乐的版本，也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版本，不过还是可以感受到，切利对乐团的控制力更为严格，声音更为干净果断，这可能也是德奥传统的特征，而 BSO 虽然早期深受德国指挥影响，但是后来也接受了法国指挥的风格，近年更被象小泽征尔、列文这样的“浪漫派”所调教，感觉德奥风味已经很难察觉了。当然，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比较一下，所谓版本比较，有时候只是为了更好理解乐曲本身，毕竟我们所面对的是不同指挥的再创作，就象巴伦博伊姆所言，交响乐的“在场”性是音乐的不断创造性生成的重要特点，指挥在这个过程中也参与了作曲家的创作，因此也让不同版本的演出显示出饶有兴趣的多重阐释性。

而我又打听到，位于市中心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将会在每周五 12 点 15 分举行管风琴音乐会，会请波士顿或者世界各地的管风琴演奏家来演奏半个小时，而且是免费，当然您如果有意为教堂奉献，也可以捐 5 美金。我对管风琴所知甚少，前去无非是想有所感受。当天是来自纽约复活教堂的管风琴师 David Enlow，曲目则分别是 Percy Whitlock 的 Fanfre, Marcel Dupre 的 Variations sur un Noel 以及可能大家会更熟悉的埃尔加的帝国进行曲。于我而言，管风琴只限于在 CD 上听过的 Buxtehude 与 BACH 的几首作品，而这却是第一次在教堂里亲身聆听管风琴，无法为大家详细介绍个中奥妙。《独立阅读》的马慧元小姐练习管风琴已有年月，见识非我所能及，或许应该期待她未来在这里撰文作相关的介绍。



就在同一周末，BSO 又推出了列文指挥的马勒第六交响乐，按照列文在乐曲导读中的解释，他承认这是首非常难以诠释的交响乐，但是其包含的活力却让他神迷。这首曲子作于 1903 年，最后直到 1905 年才完成，不过大部分乐思基本都在 1903 年的夏天就基本确定。根据 Henry-Louis De la Grange 的巨著《马勒》（Gustav Mahler）的描述，在 1903 年马勒写作第六交响乐时，他比较少见的在第一乐章中加入了奋勇反抗的风格，使得第一乐章的进行曲风格不同于第五中的葬礼进行曲，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此时的马勒，展现出少为人知的坚毅一面，这一切或许要归功于他与艾尔玛的精神默契。不过这一切或许都是暂时的，他们之间的摩擦也在不断升级，甚至艾尔玛会对马勒终日只与朋友周旋，只沉醉在音乐世界里，



而对性生活表示冷漠而感到万分沮丧，当然，这一切只不过埋下了日后艾尔玛出轨的一个伏笔而已。

对于我个人而言，马勒曾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个心理阴霾，曾经在一段非常低迷的岁月里，在一次听到马勒某部作品时突然扔掉耳机，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音乐中那种让人窒息的阴郁感，从此 10 余年几乎没听过马勒，并将其看作是“黑暗力量”的病态符号。

岁月荏苒，今日已无当年那敏感脆弱的情绪，或许可以颇为坦然地去理解马勒的内心世界。应该说，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我都十分困惑，因为我实在没有找到一个理解的角度。由于马勒第六的谐谑曲(Scherzo)与行板(Andante)两个乐章的顺序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周五晚上的是先行板后 Scherzo，而周六晚上列文将这个顺序改作他更认可的先 Scherzo 后行板，考虑到周五晚上我听完了的困惑，更重要的是，我可以继续利用学生卡免费听第二天的演出，所以周六晚上，我又听了一场，终于对这首曲子有所确切的体会。

第一乐章的进行曲表达出的是一种无畏而且雄壮的决心与希望，BSO 的演奏当然相当不俗，而且波士顿音乐厅的音效在这样宏大的曲目下表现的淋漓尽致，管乐的穿透力与弦乐的浑厚底色共同烘托出一种英雄独立的豪壮色彩。接下来的谐谑曲依旧延续第一乐章的进行曲风格，但是更为急促和紧张，序幕拉开的决斗氛围已经初现端倪，偶尔的缓慢乐句也可感受到弦乐部分的急促感，而行板乐章的旋律则可称为相当优美，居然可以让我感受到在马勒作品中极难听到的美妙感。而最后一个乐章的那三下铁锤声自然是高潮部分，象征着英雄死亡，乐曲最后以一段铜管的独奏减弱到近乎无声之时，突然全部乐曲奏出一个最强音后噤然而止，有如命运之门的紧闭余音。在这里，马勒此曲的“英雄悲剧感”就异于贝多芬的“扼住命运的咽喉”，在马勒那里，命运固然可以反抗斗争，但是其结局都是宿命的，都是难以摆脱的无力与悲剧，而我也就突然醒悟，十多年前我的不快经验，或许是因为当年的我，还无法接受命运之无可改变的悲剧性，从而对这样一种阴暗的隐喻强烈反抗。今日重来，我依然无法接受马勒，但是却能深深地理解他内心里风起云涌的绝望感，那是一种没有胜算的斗争，是注定接受败局的对抗，而在这种冲突中，马勒试图将人生解释成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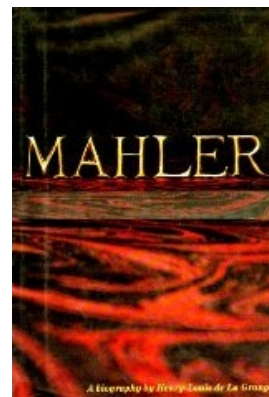
BSO 的演奏让我十分沉醉，尽管第一天的演奏在技术上更无可挑剔，但是第二天的乐章安排使得整支曲子的结构更加顺畅，更容易为人理解，也就是使得那天的音乐厅里，弥漫着一股难以松懈的紧张氛围，而这一切，也让我有足够的理由忽略最后一个乐章中小号所吹破的几个音。

在乐队的噤然而止后，列文也足足有 6、7 秒钟停在那里，观众也随着一起沉默，体会着那死一般的沉寂。这几秒钟也构成了整支曲子的重要部分，因为这样的悲剧感是无法用掌声去迎接的，那是我们面对的一种共同处境，只能以沉默面对。片刻后，观众纷纷涌到前排向列文欢呼，让我由衷而生感动，不是因为欢呼，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毕竟存在这么多丰富的心灵，让我们共同去面对一些复杂的心灵困境，这种“共同感”让人生敬，音乐本身，此时似乎在悄悄走远。

这里可以提前预报的是，下月将会有数场重头演出，比如列文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波利尼(Pollini)的舒曼钢琴协奏曲，而波士顿巴洛克乐团也将会上演亨德尔的巨作《西流士》(xerxes)，Boston Cecilia 更将上演巴赫的重戏 MASS in B Minor。

对于爱乐人士而言，波士顿实在是一块梦中的乐土。

（部分图片系作者及他人现场所摄，请勿它用）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JAPAN 日本

神圣的“牺牲”逻辑背后

特约撰稿人：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对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 5 年半，6 次参拜靖国神社，重创日本对亚外交的问题，中、韩两国与日本的学界、媒体都在反思，旨在使历史认识超越国界，避免悲剧重演。但是，从各国已公开的材料看，不能不说这场反思的深度其实有限，尚未达到足以规避类似的历史认识或因政治问题引发国与国之间外交冲突的风险的程度。相比较而言，中、韩的“口诛笔伐”多停留在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恰恰是始作俑者日本，其反思却触及了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乃至思想史等层面，一些左翼良心学者连续推出重量级专著，其中不乏在主流知识社会影响巨大的学术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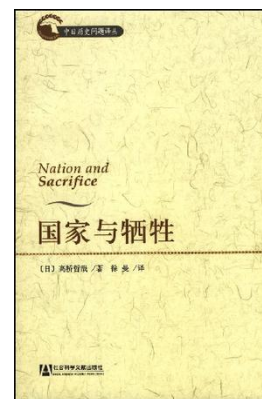
东京大学哲学教授高桥哲哉（Tetsuya Takahashi）的《国家与牺牲》，系继创造了近年东洋社会学术书籍发行奇迹的《靖国问题》之后，又一部揭示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以国民个体的生命为代价，以血的祭祀来维系国家神话长存不破的、被称为“牺牲”的秘密装置的构造。

以国家的名义，国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国家把死于战争的国民颂扬为“为祖国”做出的“崇高的牺牲”，并在靖国神社这样的招魂场所予以“英灵彰显”。通过如此程序，无论是阵亡的军人，还是屈死的非战斗人员，统统成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的“牺牲”；而这种死，也超越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其他国家话语中的一般性表述一样，成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正是靠这种“牺牲”逻辑，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马不停蹄地杀出了一条军国主义的血路，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生灵涂炭之祸，也置自身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作者通过考察小泉历次靖国参拜时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发现一个为后者爱用不已的关键词叫做“崇高的牺牲”。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措辞，而是其念兹在兹的“牺牲”逻辑之根本所在。正是通过这种无不煽情的“修辞”，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牺牲”才显得如此“崇高”，崇高得超越了战争本身的正义、非正义属性，实现了正当化的转换。譬如，2004 年新年伊始，小泉在作为“初诣”（即新年后第一次参拜）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对新闻记者发表感言说：“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在这里，仿佛不经意地，逻辑链条发生了微妙的跳跃：好像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国民的“牺牲”，才成就了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前者成了后者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如果联想到此后不久自卫队即被派往硝烟未尽的伊拉克战场，而日本政府事先并无不损一兵一卒的绝对把握的话，小泉讲话的逻辑跳跃便不奇怪了。因为基于同样的修辞，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自卫队员之死，未尝不可以被定位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

对此，作者正本清源道：“事实上，日本的国家指导者们如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本来可以不去送死的将士们，同亚洲各国、盟军以及日本的民间死者一样，原本不应该死的日本将士被逼到了死路上，终于以日本的凄惨的战败而告战争结束。”

关于“终战”，历来的说法是：1945 年 8 月 9 日，美军在长崎投放第二颗原子弹，浦上地区 8000 名天主教徒被“燔祭”。昭和天皇为了制止国民更大规模的牺牲，终于做出停战的“圣断”。1945 年 8 月 15 日，“玉音放送”宣布“停战诏书”，战争始告结束。此乃战后广为流传的“圣断”神话的源头，也是天皇终被免责的最主要理由。但是，作者敏锐地指出，时间才是关键：“首先，即使说是天皇下‘圣断’结束了战争，但问题在于这个‘圣断’不是下得太迟了吗！”在同盟国以《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大本营的“御前会议”还在讨论投降还是抵抗，结果是“不理睬”。这是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其“守护国体”（即维持天皇制）的要求能否得到盟国的保证，只此一点就使日本推迟了接受公告。而如果迅速地接受公告，便有可能免遭原子弹的袭击。这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问责天皇的左翼政治话语的主要依据，所谓“迟到的圣断”。



其次，“圣断”之迟到不仅反映在广岛、长崎问题上，在冲绳战役上亦如此。理由是1945年2月14日，昭和天皇斥退了“近卫奏折”：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对昭和天皇上奏说，“战况恶化，由此下去战败无疑；如果战败，陛下的最大愿望之‘守护国体’本身便会受到威胁”，以敦促“圣断”停战。可对此，天皇却认为，“停战活动若不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就很难谈判”，从而延误了谈判的良机。而如果天皇采纳“近卫奏折”，适时下达停战的“圣断”的话，不仅会免于“原爆”之祸，后来于3月开始的、致19万日军民“牺牲”的地狱般的冲绳战役或可幸免。

也许历史无法假设。但客观上，由于“圣断”的姗姗来迟，不仅使日本在广岛、长崎、冲绳多付出数以十万计的“崇高的牺牲”，同时也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声浪始终不绝于耳的主因。

作为哲学家，高桥不满足于只在社会学、政治学层面对国家的“牺牲”逻辑做单纯的道德批判，而是对其起源做了一番从语文学、宗教学到人类学、历史学的追溯。通过梳理发现，“牺牲”逻辑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历史之中，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更堪称源远流长，且从古至今，几乎从未受到过根本性的质疑、批判。不仅“为国捐躯”是“崇高的牺牲”的观念根深蒂固，早已沉淀为“国民精神”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拥有军队或武装组织的国家来说，战死者祭祀体系中包含“牺牲”逻辑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祭祀，彰显“英灵”，并使之神圣化（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而为随时准备应对战争状态的国家体制的存续提供保障。用日本右翼学者中西辉政的话说：“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作为国家的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

虽然与这种诉诸国家主体的强有力的“牺牲”逻辑相比，高桥的追问（“没有牺牲的国家，没有牺牲的社会”能否存在，我们能否超越这个国家原理上的“牺牲的逻辑”？）显得虚幻、飘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后西方社会，尤其是德意志等欧洲国家，那种在一战前后达到顶峰的“战死者祭祀、英灵表彰”制度逐渐衰落，现代战争空前的残酷和毁灭性使源自基督教的视民族国家为“神秘体”，以及把为此而“牺牲”的行动等同于“殉教”的观念，失去了昔日神圣的光环和感召力，代之以对该制度及现代民族国家构架本身的反思。

而日本作为近代以来，以其殖民和侵略战争对亚洲邻近国家及世界造成剧创深痛的国家，纵然因这样或那样的、有些是非主观性的因素，至今尚未彻底完成对包括“靖国思想”在内的战争史观的清算和反思，或者只停留于政治、外交性的权宜层面，有待深入。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家、媒体在靖国参拜和“英灵彰显”问题上的不恰当言动，未必不会对本来就缺乏彻底性的对负面历史遗产的反省产生某种反作用力。这是日本社会必须要警惕的苗头。

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在其批判国家神道的《国家神道的现在》一文中，曾论证过所谓“祭祀之国家”即为“战争之国家”的关联项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宣告成为“不战之国”的日本宪法，理应自动成为“不祭祀之国”的规约；而所谓“战之国”，实为“祭祀之国”；祭祀，则离不开牺牲。这成为其国家神道论批判的基轴。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似有再度强调和捍卫的必要。

【日】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三联书店，2007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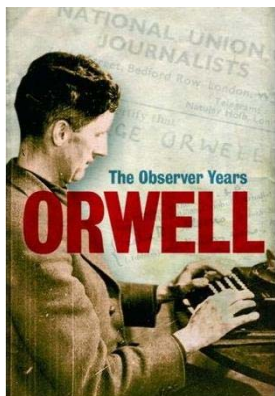
【日】高桥哲哉：《国家与牺牲》，徐曼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

ENGLAND 英格兰

奥威尔的“观察家”岁月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英国·谢菲尔德，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读过奥威尔的小说，不一定读过他的通讯与书评；认识作家乔治·奥威尔，不一定认识记者埃里克·阿瑟·布莱尔。举个例子，1945年奥威尔应《观察家报》之邀前往德国报道盟军的消息，途径巴黎时，他曾留宿一晚，碰巧在旅馆登记表上发现了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名字。于是，奥威尔兴奋地敲开了海明威的房间，自报家门，但海明威半天也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布莱尔先生何许人也。直到奥威尔以笔名相告，对方才恍然大悟，并立即开了一瓶芝华士，算是赔礼。



奥威尔夜访海明威，自然不是为了叙旧。他知道海明威在写小说之余，也是个玩枪的高手，这次在巴黎相遇，使得一直担心被苏联特工跟踪的奥威尔有机会求助于海明威。最后，海明威答应借给他一把点 32 口径手枪，作防身之用。

但奥威尔一代鸿儒，何以落到整天心怀戚戚、枪不离身的地步呢？1945 年，奥威尔完成了《动物农庄》，这部被后世誉为艺术性超越了《1984》的小说，竟像烫手的山芋，没有一家出版商敢伸手去碰。原因再明显不过：苏联老大哥与英国的盟友关系当时尚未拉爆，而小说里那只驱逐了“雪球”的公猪“拿破仑”，不俨然是敬爱的斯大林元帅么？最后，还是先前出版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 Secker & Warburg 出版社替奥威尔出头，在当年 8 月即发行了《动物农庄》。或许正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奥威尔不久后辞去了《论坛报》的文学编辑职务，并被《观察家报》“发配”去海峡对岸的欧洲。一来确实有撰稿之需，此外也算是暂避风头。而到了离苏联更近的德国，奥威尔也不得多长个心眼。毕竟，战地记者出点“意外”的几率实在太高了。

从 BBC 到《论坛报》再到《每日镜报》，奥威尔与英国媒体的关系从来是若即若离，唯独与《观察家报》多年来肝胆相照，直至他 1949 年因健康原因辍笔。从 1942 年 2 月起，乔治·奥威尔正式成为《观察家报》写稿，开始了七年的“观察家”岁月。奥威尔的朋友，时任总编辑的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正着手大刀阔斧地改革《观察家报》的办报思路，新开辟了多个时政专栏。此前，《观察家报》的主编是著名的右派报人 J.L. 加尔文。阿斯特入主后，对于报纸内的托利党“毒瘤”予以最大限度的“肃清”，使其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左派报纸。

当然，奥威尔与《观察家报》的立场仅仅是“偏左”，尚不“激进”。或者可以将之理解为以下三条：关注英国的劳工阶级，同情殖民地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在这三个方面，奥威尔颇能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比如，当踏上德国土地的时候，奥威尔强烈地感受到因多年的敌对宣传而造成的“海峡两岸”人民对彼此的误解。巴伐利亚的纽伦堡，尽管被人视作纳粹的起源地，但在他看来与别的欧洲城市并没有太多区别。奥威尔虽然不遗余力地反对法西斯集权政府，但他还是思考着，“巴伐利亚地区朴实的农民与这场战争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战胜国英国，在他看来仍旧是一个毫无活力，充满消极情绪的国家。奥威尔曾在 1944 年的一篇社论中说道：“相信政府可能进行战后重建的人越来越多，但相信其有能力做到的人却没有几个。领导阶层和被领导阶层的裂隙在不断扩大，而那个充满怨恨的字眼‘他们’削弱着我们的信心，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据此，奥威尔断言说最可能的情况是，大英帝国在 1945 年之后不是迎来 1946 年，而是回到内忧外患的 1918 年。因为这时的奥威尔已经预感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殖民运动即将到来。

奥威尔的写作量和写作速度都是相当惊人的。在此期间，他写作了上百篇稿件和大量散文。据他的一位挚友，同时也是奥威尔传记的作者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回忆，奥威尔写作通常不需打草稿，直接在打字机上完成。在咖啡馆与朋友聊天时，奥威尔时常会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而听众们则会在不久后出版的报纸上发现奥威尔据此撰写的一篇评论。奥威尔撰稿如此多快好省，与他在《政治与英语》中提倡的将书面语和口语结合有很大的关系。

1943 年到 1946 年，奥威尔开始为《观察家报》撰写书评，每两周一篇，从未间断。书评既涉及了埃德蒙·威尔逊、哈罗德·拉斯基这样的作家，也谈到了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哈耶克的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奥威尔对萧乾编选的英译作品集《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和《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的两篇书评。在谈到以萧乾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机械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时，奥威尔说过一段话，不妨抄给大家：“萧乾先生对此深信不疑，同时他也可以充分地证明，他的同胞们并不满足于物质文明。他们的文化与艺术传统如此根深蒂固，机械文明无法将之摧毁。同时，中国将要屹立于现代世界，她已经不喜欢被西方人告知说：脑后的辫子比头上的钢盔更好看。不过，如果中国可以适度地远离外面世界的干扰，她会安然地回到自己闲适的传统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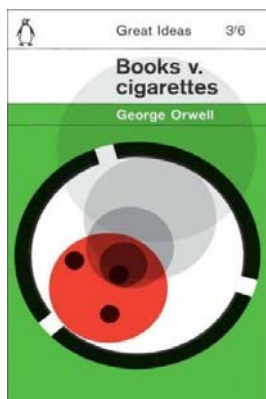
当然，书评只是“副业”，《动物农庄》才是奥威尔写书评期间耗费心血最多的作品。或许受到了小说主题的影响，奥威尔的书评同样显示出对苏式社会主义和集权政府的强烈反感。据说，他的一篇言辞刻薄书评得罪了昔日的座上客 H.G. 威尔斯，原因是威尔斯在一本书里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某种向往。威尔斯在读过那篇文章后火冒三丈，发誓不再同奥威尔讲话，事实上，他也是那样做的。

Orwell: *The "Observer" Years* (Paperback), Atlantic Books, Aug 2004.

读书这么实惠的事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英国·谢菲尔德,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读书之趣,古人每常乐道。但中国人谈读书,总爱摆出学问家的姿态说教一番,然后便夸耀起自己读书的方法、老子当年如何如何,或者像二十年代的《京报副刊》那样,直接开出“青年必读十部书”。英国人似乎不太愿意公开谈读书,认为这个题目涉及了个人隐私。即使偶尔谈谈,多半是像培根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其实”,絮叨如大夫开药单,让人听不进去。奥威尔谈读书则比较干脆,一支笔、一张纸,给你算一笔经济帐,然后问:书和香烟,你选哪一个?



在《书和香烟》(Books v. Cigarettes)里面,奥威尔讲述了他的一位朋友的见闻。此君是某报社的编辑,一次在执行“fire watching”(二战期间伦敦地区的志愿火警)时偶然遇到了几位工人,发现他们很喜欢谈论他所编辑那份报纸的新闻,于是忍不住插嘴问他们对于文学版的看法。谁知工人兄弟们拒绝谈论这个话题,并且没好气地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现在谈论的是要花上十几镑才能谈论的东西,咱们可没那么多闲钱看书。”读书真的是一件昂贵的嗜好吗?不错,英国的书的确价格不菲。但看了奥威尔为我们算的明细帐之后,读书又忽然之间成了一种最经济的打发时间的方式。

首先,书籍的来源很多,不一定非得读者掏钱,或者掏很多的钱。奥威尔列出自己442本主要藏书的来源,其中251本来自二手渠道,143本属于便宜的复制品,都是不怎么花钱的东西。再加上他散落各地的藏书,差不多有900来本。奥威尔估算了一下,书籍的总价值在165英镑左右。但这几乎是他15年的积累了,因此把165镑这笔钱分摊到15年中,每年的书籍开销其实是非常小的。

另外,看书非得买书吗?也不尽然。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其实英国人也一样。不过英国的“非借不能读”不是说你迫于“催还”的压力而认真读书,而是“久假不归”,还书日期一拖再拖,最后拖成一笔“坏账”。在《书店回忆》(Bookshop Memories)一文中,奥威尔谈到,英国书店不仅卖书还可以借书,并且借书不要押金,归还全凭自觉。当时的确有一部分人会借来的书据为己有,但书店方面却坚持不向读者收押金,因为他们发现收取押金会吓跑大部分读者,而不收押金还能招徕一些顾客,虽然“每个月至少会因此丢失十几本书”,但两相权衡,总算利大于弊。

虽然“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但当过图书管理员的奥威尔对“窃书”一事实深恶痛绝。他还是鼓励读者以正规渠道订购书籍与报刊。按四十年代的物价计算,8镑一年的开销意味着你在这一年中可以读到两份日报、一份晚报、两份周刊和评论。当然,订购需求也视读者的阅读量而定。但无论如何,一个人一年花在阅读上的资金不会超过25镑(你如果执意要做冤大头,整天跑到Blackwell's去买原价书,那就另当别论了)。且看奥威尔为我们铺陈的明细帐:如果把25镑平均分摊到每一周,那么其价格相当于战时的83根Player香烟,但在那个时期,作者自己每年要花40镑在抽烟上。战前的价格可能更便宜,差不多10镑一周。但一般而言,烟酒不离,每周能抽一盎司香烟的人,每天也得喝掉至少一品脱啤酒,这样算来,即使在1939年以前,个人烟酒的消费就已经超过了阅读的消费。

如果计算得更仔细一点,阅读的时间也应该考虑进去。比如,你花8个先令买了一本书(按照70年代以前的算法,8先令相当于2/5英镑,也就是96便士),然后花4个小时读完它,那么每小时花费计2先令。而看一场电影,时费也是这个数。但书籍不同于别的消费品就在于它可以反复阅读,一本书重复读的次数越多,你每一次花在阅读上的开销就会相对减少,而电影院每次进去都得掏钱。若买的是二手书,那么每小时花费更可低至6便士。再说了,如果更节省一些,你大可以直接去公共图书馆看书,或者像古人王充一样站在书店里边看边背。这样的开销,就基本等于零了(it costs you next door to nothing)。

奥威尔的《书和香烟》是企鹅出版社“伟大思想丛书”(Penguin Great Ideas)的一种,收录的文章多写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之后和《动物农庄》之前。当时的他,更像是一位左翼的社会学家,对英国知识分子和劳工阶级阅读差距的增大,颇为忧虑,因而半开玩笑地为英国读者撰写了这份“建议”。在书价日益昂贵的今天,重读奥威尔的“建议”让我们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价格不是我们不读书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阅读的一个理由。

George Orwell: Books V. Cigarettes (Paperback), Penguin Books Ltd, Aug 2008.

书评·文学

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 iamlingyue@yahoo.com.cn)

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与他交谈,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体验。通常,写作——哪怕是不那么出色的写作,也会给人留下较为严谨的印象,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思考揣摩的痕迹,你可以发现他在挑选一个准确词语时的煞费苦心。可是当你和他面对面谈的时候,那种凝重的感觉将会减弱许多,他甚至可能是一个风趣的妙语连珠的人,或者相反他也有可能让我们大失所望,竟然是一个闷葫芦。因为很简单当我们交谈时,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是如此之少,比如当你的谈话对象结束一个提问,正常情况下你得在数秒内给出回答,否则那将是一段让谈话者双方都倍感压力的沉默,当然也许你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作家,那么你可以通过支支吾吾换来多几秒钟的遣词造句的时间,可是对比于你独自在屋子里的写作(你甚至可以为一个合适的句子,平心静气地斟酌一个钟头),谈话永远是仓促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作家的作品集似乎总是要比他的谈话录更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在谈话中倒是更容易见出一个作家的性情——他用不着或是来不及在自己谈话的同时迅速地打量自身,以便以自己较好的一卖面展示于人。

写作和谈话另一个显著的不同则是,每篇文章总是有它自己的文风和内在的逻辑,有时候一个作家为一篇文章或是小说准备了大量素材,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文章本身有一个主动筛选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你写下第一句话的时候,这篇文章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作者,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尊重它的选择。可是谈话就不同了,话题的转换在谈话中经常显得突兀又自然,只要你想起来某个有意思的话题,那么你就可以随时带入,而不必顾忌它是否合适恰当自然,因为谈话没有外在文体的约束和控制,当然有经验的谈话者会围绕几个主题展开,以求得对某个问题的纵深的探讨,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突发奇想和节外生枝,所以谈话往往是几个线索并进,它的发展全在于谈话者自身的状态和兴致。这样也就带出了又一个问题——谈话对手往往决定着某次谈话的技术含量和价值所在。一个好的谈话对象往往能激发出作家的潜能,反之的一场沉闷的乏味的交谈只能草草收场。高质量的谈话经常会使参与者道出令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的看法和结论,某种程度上,谈话就是一次即兴创作,状态好的时候,那种瞬间的爆发力也是那种苦心积虑的思考无法企及的。

具体到《布罗茨基谈话录》,这无疑是一部有魅力的谈话录,访问者沃尔科夫本身是一位音乐家和文化史家,熟悉乃至精通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史,1978年秋天,他去听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深受震动,遂产生编撰《布罗茨基谈话录》的动机,并很快征得布罗茨基的同意。两人的谈话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末,断断续续持续到1996年布罗茨基心脏病发辞世。这一“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显然没有辜负两位谈话者的苦心,这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的谈话录,虽然也许没有沃尔科夫在序言中提及的《歌德谈话录》那么伟大。既然,沃尔科夫特别提及《歌德谈话录》,我们不妨将两者简单比较一下。首先,歌德的谈话显然要更放松,如果说谈话录是文学中的一个近代体裁的话,那么在歌德那个时代就更没有榜样可以依傍,事实上,歌德仅仅是在向一个好学的邻居兼后生传授写作之道,至少对歌德而言,他没有指望这谈话录成为某种经典,这也就使得歌德在谈话中更加直率和直接地谈论诗学的各种问题,没有沾染后代诗人(包括布罗茨基在内)在谈话时掩饰不住的野心,在这里野心再次起到某种阻隔作用。歌德的访问者爱克曼比歌德年轻许多,除了这部《歌德谈话录》他没有其他的作品传世,这使得爱克曼在谈话中显得更为谦逊,是一个仔细的聆听者的角色,而沃尔科夫则和布罗茨基年龄相仿(年轻四岁),而且他本身是有造诣的文化史家,他和布罗茨基的谈话在角色上更平等一些,在许多时候他也不惮于亮出自己的观点,甚至和布罗茨基迥异的观点,那么他和布罗茨基的谈话火药味就要浓一些,经常有观点的交锋。还有就是都是诗人谈诗,歌德谈话录在文学批评的价值上更大一些,布罗茨基的谈话虽也不乏对诗歌的真知灼见,但是至少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是在追述往事,颇有历史见证的意味。

《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诗歌,具体的说是布罗茨基一直推崇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奥登、弗罗斯特等,这几个诗人书中都专章谈到;一是布罗茨基个人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他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到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



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对于自己喜欢的这几位诗人，布罗茨基都撰文介绍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关于阿赫玛托娃的《哀泣的缪斯》、关于奥登的《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关于弗罗斯特的《悲伤与理智》。这是尽显布罗茨基出众的批评才华的文章，主要在诗艺上探讨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只有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才少许带出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布罗茨基这样描述阿赫玛托娃的外貌：“她看上去相当漂亮。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一般灰蓝色的眼睛，苗条的、柔软得那以置信的身段。”但是在文章中你仍然找不到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私人交情的例证，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任何一个自尊的诗人而言，在他评述一个朋友的诗作时带出这种友情，不仅是侮辱了这友情，通常也会影响到批评的公正，哪怕仅仅是在感觉上。可是在谈话中，则有大量的交往细节，谈话的确和文章所负载的道德责任不同，在谈话中谈及自己朋友实在要自然得多，况且还是在另一位好奇者不断的追问和引诱下。

四位诗人中，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奥登有过直接的交往，没见过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纯粹是热爱他们的诗歌，可是这热爱也很自然令他去了解他们，那么在谈话中我们仍然获知了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生活中的某些“秘密”。可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秘密呢？众所周知，诗人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说他蒙受了苦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在谈话里，布罗茨基也反复谈到这一点：“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某种次要的东西。”“谈生活——无非是猫抓自己的尾巴，瞎折腾。”可是每个作家都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那么生活和作品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则恰恰是值得我们细究的地方，那里面藏有写作最深的秘密，布罗茨基显然对此亦深有感触，也有很深入的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对一个诗人了解得越多，对他的诗也就理解得越深。

毋庸置疑，茨维塔耶娃是布罗茨基最推崇的20世纪诗人，他在谈话中也反复申明此点，布罗茨基认为茨维塔耶娃是“加尔文式”的诗人，即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和意识的十分严厉的清算。沃尔科夫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抖出猛料（对我而言），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曾经参与过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活动，也就是对叛逃者伊格纳季·列依斯的追杀，并说埃夫隆是“最阴暗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间谍。”而茨维塔耶娃“很显然，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接受并支持埃夫隆的”。这个猛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以为布罗茨基的辩护仍然是有力的：茨维塔耶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埃夫隆，并且一直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狗那样”跟着埃夫隆。忠贞于自己——这就是她的行为道德。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直观的恶的教训，而一个诗人是不会随便抛弃这样的教训的。灾难就是灾难，在灾难中可以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茨维塔耶娃对埃夫隆还有愧疚，他们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模样各不相同，他们长得不太像爸爸，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会使她不太急于去充当埃夫隆的法官。后者会牵出茨维塔耶娃私生活的另一面，在中国也许会有刻板的道学家对此会对茨维塔耶娃大加挞伐，可是至少对布罗茨基和沃尔科夫而言，私生活的放纵的确对诗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題，至少无关作品的优劣。

阿赫玛托娃则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另一个传奇。她的前夫是古米廖夫，20世纪初重要的艺术流派阿克梅派的领袖，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极刑，她和茨维塔耶娃和曼杰什坦姆都是至交，她一生中都不乏仰慕者和追求者（著名的有莫迪利阿尼、以赛亚·柏林），说她是白银时代的皇后也许是恰当的称谓。帕斯捷尔纳克甚至两次当着自己妻子的面向阿赫玛托娃求婚，当然阿赫玛托娃看不上他，帕斯捷尔纳克个子矮，而且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也很让阿赫玛托娃不屑。阿赫玛托娃真正推崇的俄罗斯诗人是曼杰什坦姆，甚至在曼杰什坦姆惨死远东劳改营后，对曼杰什坦姆遗孀娜杰日达·曼杰什坦姆也是照料有加，正是在阿赫玛托娃介绍下，布罗茨基曾经去莫斯科娜杰日达·曼杰什坦姆简陋的住所拜访过她，后来他给《纽约书评》撰文介绍娜杰日达·曼杰什坦姆，说她待在房间角落里，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像灰烬，碰一碰又会燃烧。在阿赫玛托娃晚年在她周围又聚拢了一群出色的年轻诗人，奈曼、莱茵、博贝舍夫和布罗茨基，他们常常去圣彼得堡郊区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拜访她，而阿赫玛托娃会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近作，听取这些年轻诗人的意见。有一个冬天，布罗茨基甚至在阿赫玛托娃住处附近租了间别墅，那时“我确实每天都去看望她，话题完全和文学无涉，谈的是人们之间——我斗胆说一句——是相互的依恋”。在谈话中，狡猾的提问者沃尔科夫提到，阿赫玛托娃对自己的儿子的命运是否带有某些冷漠？布罗茨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给予了精彩的回答：“不，生活中恰好没有冷漠。冷漠——如果这句话在这儿一般来说是适用的话——它与创作与生俱来。……你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努力营造悲剧的效果，似乎在用这种或那种诗行无意地违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这当然也是布罗茨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读者多少了解布罗茨基因为“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和庭审法官的对话曾经在西方广为流传，后来又有学者

对“布罗茨基案件”做了详细调查，还出版了专著，事件中的黑色幽默色彩尽显专制制度的荒谬可笑，可是对当事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在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初次被捕时的恐惧，“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也更详细地知道他在精神病院所受的折磨：“第一晚，我旁边单人床上的那个人就自杀了，他切断了血管。”“在那儿人们用各种愚蠢的念头刺激你，将一些药硬塞给你吃。”“你躺着在阅读，突然来了两个护理员，从床上拽起你，用床单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从浴缸拽起，但不解开床单，这种床单就在我身上结成硬块。”“他们用拳头敲你，搥你嘴巴。”难怪阿赫玛托娃曾经感叹道：“他们给我们这个红头发小伙（指布罗茨基）制造了怎样一份传记阿！这经历他似乎是从什么人那儿租用来的。”

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我们暂且说是苦难吧，有人正视它，比如有同样有过劳改营经历的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史诗，一种直接的对抗。布罗茨基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俯视乃至蔑视它。诗人米沃什曾经准确地评论过，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不会跟几乎不配享有跟他辩论特权的对手争辩。他却介入一种活动形式，被时间的暴君们解开脚镣的诗艺”。布罗茨基善于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思考这些生活中不期然的苦难或者说恶，1984年在布罗茨基任教的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布罗茨基做了《毕业典礼致辞》的演讲，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恶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不用说那些磨难给他的思考增添了韧性：“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莫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僻。”1987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再进一步，将善恶问题归属于美学的门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提出“‘好’和‘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和‘恶’的概念”。

这种由于高度带来的开阔视野，在谈话录中随处可见。比如有关弗罗斯特的那一章，沃尔科夫又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提到汤普生著的三卷本传记，传记中弗罗斯特是作为一个口是心非、小气和常常是很凶的人的面貌出现的。布罗茨基不出所料地没有附和沃尔科夫的观点，他指出在人们简单的道德指控下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弗罗斯特是难以置信的悲剧人物，他的大儿子幼时死于霍乱，二儿子自杀，一个女儿死了，另一个进了疯人院，妻子遽然去世。弗罗斯特即使在良知里没有负罪感，在意识里也会有一个负罪情节。为其伪善而谴责弗罗斯特的人，作为个体要低于他。就像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辩护一样，布罗茨基为他喜欢的每一个诗人辩护，在他的这些辩护中暗含着这样一个观念：一个诗人只要他的诗歌足够出色，其他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诗人从来就没有被先天地定义为一层不染的天使般的人物，人格的复杂倒是优秀诗歌应有的前提。

实事求是地说，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要比这本谈话录更有文学价值，谈话录中的精辟观点在他那些著名的散文中多半更为系统地论述过。但是谈话录仍然很吸引我，因为那些诗人们的故事，诗歌和别的文学门类有点不同，一旦你喜欢某人的诗歌，很自然地就会对某人本身发生兴趣，想象他的模样和言谈，想象他的喜悦和悲伤，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和悲伤。诗歌也许就是人的灵魂的外衣吧，诗歌有多绚烂似乎那位诗人就应该多有魅力，布罗茨基的谈话为此添加了新的证明。布罗茨基喜欢的几位诗人，我也都喜欢，以前只是沉浸在他们各自的文本中，而藉由布罗茨基的谈话，这些人物被串联在一起，恍惚舞台上原本孤立的演员开始发生互动，他们的面目、表情和体态也就愈发清晰了。就像一幅木刻，他们的形象最终凸显在原本平整的木板上，几乎触手可及。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刘文飞等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

书评·历史

胡风会不会成为周扬？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牛汉先生的口述自传陆续现身：2007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刊出《文坛师友录》，2007年第4期《出版史料》刊出《〈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及组稿活动》、2007年第12期《中华散文》刊出《出生入死》，《当代》分别于

2007 年第 6 期、2008 年第 1 期刊出《我的隔离生涯》、《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2008 年第 2 期《花城》刊出《我与诗相依为命》。可惜这些文章散落各处，读者不太可能跟踪阅读。等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2008 年 7 月）把它们一网打尽，这位“七月派”诗人的一生才引起关注。

我对诗人的回忆向来半信半疑，因为诗人通常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但牛汉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位编辑家，他参与创办并担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重在温故，抢救了大量濒临灭绝的文学记忆，《中国》重在知新，存活不到两年，即成为先锋文学的根据地。温故而知新本是应有之义，可是这无论对老一辈还是新一代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很多德高望重的作家包括《新文学史料》的部分作者，对《中国》不以为然；新生代喊出了“PASS 北岛”的口号，对于《新文学史料》的老朽们更是不屑一顾。牛汉一人主持两份风格迥异的刊物，这种左右互博的能力让人观止。之所以阅读《我仍在苦苦跋涉》，与其说是为了满足对“七月派”诗人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对《新文学史料》、《中国》两份杂志灵魂人物的信任。

牛汉身为“七月派”，又卷入“胡风冤案”，在谈论胡风时却保持一种难得的冷静。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开始陆续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自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100 人受到株连；1980 年，中共中央发出 76 号文件，进行有保留的平反，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1985 年，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为胡风平反；1986 年，文化部部长在胡风追悼会上致悼词，承认“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1988 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全面平反，重新评价他的文艺思想，对 1980 年的 76 号文件作出重要补正，撤销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撤销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撤销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

与 1957 年的“右派”以及 1966 年的文革受难者相比，胡风分子罹难时间最为悠久，从一网打尽到彻底平反长达 33 年。拥有这么一段深仇大恨，受难者回首往事总是习惯于诉苦和控诉。一方面他们经历的苦难让我这个后来者感到温习历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对待苦难经历的反复讲述又让我敬而远之。当然，受难者反刍自己的受难经历，这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一句话，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都会变得味同嚼蜡。当事人更多的是把诉苦和控诉当作反思，诉苦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控诉为了说明错在对方，合二为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一场正邪不两立的斗争，只是当年的正方今天被证明是错误的，当年的反方今天被认为是正确的。暂且不谈政治领域，仅在文艺领域，胡风和周扬就被描绘成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代表。

在《我仍在苦苦跋涉》里，我意外的读到这么一个细节，1954 年深秋，一位年轻人感慨：“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这位年轻人是芦甸，胡先生指的是胡风，当时绿原、徐放、路翎、芦甸、牛汉、严望等在胡风家聚会，牛汉回忆那时的场景：“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他和严望、徐放等看到胡风默许这种说法，难以接受，执意离开。与“马、恩、列、斯、毛、胡”相仿的是，彭燕郊曾表示：“现代中国有三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何香凝，第三位是梅志。”梅志，胡风夫人。芦甸系 23 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一，1955 年被捕，超期羁押至 1966 年才被判刑，随即法院宣布“提前释放”却未执行，1967 年病死狱中。彭燕郊，1955 年被捕，关押 21 个月，后在街道工厂劳动，2008 年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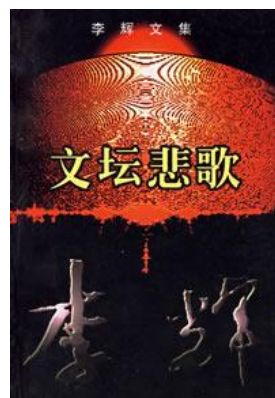
芦甸有表达“马、恩、列、斯、毛、胡”的自由，彭燕郊也有把宋庆龄，何香凝、梅志视为现代中国三位伟大女性的权利，因为这些言论把他们逮捕，这违反言论自由的原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反对抓捕芦甸和彭燕郊，不等于承认或者接受他们两位的观点。中共中央撤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指责时表示：“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决策非常英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大罪状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批判胡风属于项庄舞剑，意在对话言自由和结社自由进行限制。后来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冤案，主要基于对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种公民权利的维护，基于对宪法的尊重，并不等于胡风及“胡风集团”站在真理的一边。受难者认为自己因为坚持真理而受到惩罚，我同样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冤案，但理由是不应“以言治罪”，哪怕胡风的言论是值得商榷的，他也有说话的权利。



如果胡风拥有权力，他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周扬？会不会限制言论自由或者以政治权力干涉言论自由？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从已有史料进行推断，结果并不乐观。吴永平先生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里，详细梳理了胡风与“持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关系：1944年，胡风号召“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组织石怀池、路翎等批评姚雪垠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姚雪垠被打成“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1947年，姚雪垠发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随后胡风组织对姚雪垠的反击，阿垅在《泥土》第4期发表《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按照胡风指示揭露姚雪垠的“生活关系”，暗示姚雪垠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看出，这涉嫌诽谤和造谣，不仅越出文艺争鸣的范围，也越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如果说这种冲突还限于言论层面，胡风和周扬之争则转移到政治层面。吴永平在《揭露胡风万言书真相——兼为舒芜辩护》（2004年第11期《书屋》）里，揭示了胡风“促使思想问题政治化”的过程：1954年，胡风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表示：“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对于此前毛泽东发起的《武训传》批判，他感到意犹未尽，呼吁党发挥在文艺事业上的领导作用；胡风不仅在信中公布了周扬的私人谈话，还添油加醋地指责“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1978年，胡风回顾往事，明确表示：“我后来在呈中央报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为中心或归结的。”被打倒之前的胡风，与周扬后来在文艺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非常相似，只不过他是失势者，而周扬是得势者。在以政治权力干涉言论自由上，他与后来批判他的人没有根本区别。胡风的罪状与胡风指控周扬的罪状如出一辙，胡风检举周扬的私人谈话，与舒芜交出胡风的私人通信，仿佛按照同一个脚本演练，不知这是巧合，还是有关部门请君入瓮？

拥有了权力，胡风可能会与周扬一样对待“持不同意见者”；尝过失去权力的滋味，晚年的周扬有时甚至比胡风还要“开明”。反思“胡风会不会成为周扬”，不是要对昔日的受难者投井下石，这里只是想说明一点，受难者不会因为受难自动站在真理的一方。牛汉讲述的秘史，提醒我们“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统一思想的整体，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以胡风为核心紧密团结在一起，另一个群体逡巡在外围，他们尊敬但不盲目崇拜胡风，视胡风为师友而不是伟大导师。后面这个群体包括听到“马、恩、列、斯、毛、胡”感到不安并且退场的牛汉等人，也包括贾植芳先生。在《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花城出版社，2003年）里，李辉先生记下贾植芳的一段话：“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鬼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书，实际上和过去传统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不能容人。”徐放也有类似的反思，他表示：“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陈思和先生在《“胡风分子”——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2008年第5期《随笔》）里也透露，贾植芳私下里多次提及：“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当时历史的产物，现在看来也有左的地方。”事实上，不仅在当时，即使到今天，“胡风集团”的一些受难者在思维上也更接近当年的批判者，比如何满子先生听到上海某大学准备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撰文《这不是反了么？》（2006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痛斥张爱玲和胡兰成是“一对狗男女”，质问学术讨论会“岂非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民族气节的嘲弄”。从文风而论，这篇文章更适合刊登在林默涵和魏巍主编的《中流》杂志上，可惜这份杂志已经停刊。一个当年的胡风分子，一个当年的文艺官员，一个当年的当红作家，前者与后两者似乎处于冰火两端，但是在几十年后他们在话语方式上握手言和。

回顾“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史上著名冤案，不仅要反思政治权力对文艺问题的频频介入，更要反思知识分子内心的暴虐、欲望和权力诉求，如果没有两者里应外合，那些冤案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顺利上演。虽然这里对胡风重在批判，但有一种指责我认为不能成立，那就是宗派主义。李普和李慎之两位先生读过介绍胡风和姚雪垠之争的文章之后，认为胡风相当“左”，宗派主义相当浓。前半句没有太大问题，后半句值得商榷，所谓“宗派主义”，往往是在结社自由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结社自由不成问题，“宗派主义”也就算不上什么事情了。



随笔

对香港最大的留恋

特约撰稿人 严飞 (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

在离开香港之前，很自然地被所有朋友问及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对香港最大的留恋是什么？

“书店”。每一次我都会毫不犹豫的回答。

这样的回答每一次也都会招来朋友们惊奇的眼光，他们接着会问我，你离开家乡南京，离开上大学的城市上海时，所留恋的也会是那里的书店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反而犹豫了很长时间，似乎我最怀念的，反而是南京的城墙，上海的弄堂。不错，南京和上海，都有环境优雅，适合消磨一个下午的宽敞大书店，也有大学周围那些小巧但充满了无穷文化韵味的人文小书店。香港呢？那些逼仄杂乱，愈搬愈高、愈高愈少的二楼书屋，那些永远抢占畅销书榜前列的投资理财、运筹八卦、政治秘闻类杂书，以及那种愈发凋敝的读书氛围和文化气息，似乎越来越成为我笔下批评的对象。

香港不是一座读书的城市，这似乎早已经以“公理”的形式成为人们的共识：香港太喧闹，太商业，太吵杂；购物天堂、美食之乡、动感之都、国际金融中心，每一句耀眼的标语口号都在渲染着这座城市的动感新潮，它的物欲横流。按照陈冠中的话说，香港社会的普遍心态，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到头来，大学教书的迷股票，媒体做报纸的搞网络，政府当官的帮忙催谷楼市，却唯独缺少了沉下心来读书的人，以及一座城市本该具有的地标性书店，譬如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旧金山的“城市之光”，纽约的“高谈书集”，费城的“博得书店”。所以台湾钟芳玲一本《书店风景》，里面没有提到香港，也是理所应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60 岁才开始写作的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Penelope Fitzgerald)，她一生只写过九部小说，却有三部入选过布克奖的提名。在其中一部名为《书店》(The Bookstore) 的小说里，菲茨杰拉德通过描述一位寡居老妇人弗萝伦丝 (Florence) 如何在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上开书店的故事，来揭示出主人公“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和“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的冲突与矛盾。在小说里，书店的存在与否，对于小镇上的居民来说甚至没有街边一只小狗的命运更受关注，所以当主人公决定在书店里引进《洛丽塔》一书时，遭受到的却是小镇居民的不理解，甚至嘲讽。

“要是《洛丽塔》是一本好书，我就要在我的店里卖它。”老太太如是想。一个人对书店最质朴的热爱，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只是一件荒谬而可笑的事情。没有书店的日子，生活会否缺失什么呢？如果无所谓缺失的话，为什么还需要书店呢？其实这个偏僻的英国小镇就是一个隐喻，几乎可以代表着一切世故、保守、功利、过于物质和精明的城市，并且无一例外的，都“不需要一家书店”。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独独只会怀念香港的书店呢？这真是一个很有趣并吊诡的问题。难道是因为我外来者的身份，以及长期以来那被禁锢不可触及的两岸三地的读书资源，放大了我的这种认识？还是因为那零散分布在高楼大厦间，惨淡经营着一家家二楼书店小老板们的坚持，以及他们对香港的关切与责任感，感染了我对香港的热爱，进而爱屋及乌地爱上了这里的书店？

对此，梁文道先生曾这样回答过我。在他看来，香港的书店就如同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洲，只有住惯沙漠的人才会敏感地知道绿洲的数量、方位与大小，并且以它们为每趟行程的重要标的。久而久之的，书店就会被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梦想，并且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去寻求。

这是读书人的梦想，然而个人对于书店的留恋再过于热烈，放置在众声喧嚣的大众世界中也会显得如此之微不足道。书店是每一个爱书人灵魂深处可以为之依托的一种精神上的体认，而这种体认也让一座城市的读书人得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群体和空间，不至于迷失在乌托邦式的纯精神臆想之中。尤其对于香港而言，这份体认弥足珍贵。现实的浮躁与功利已经让香港头上那顶“文化沙漠”的帽子越带越高，但那些在城市转角间、旧楼陋巷中豪不张扬的小书店，却是这座城市散发的最后一束流光，温暖而柔软。

我希望这束流光可以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光亮；如果再奢侈一些，我希望它还可以穿透这物质世界的种种流毒与阴霾，点燃我们心中的光亮。

声音

哈罗尔的独奏会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 (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这辈子我就感谢老师一件事情，就是她叫我去办公室讨论问题的时候随便打开一封EMAIL，灵机一动地问我，这里有场音乐会，你想去吗？我探头一看，天啊，原来是哈罗尔(Lynn Harrell)的教师独奏会，离我们这里不足20分钟路的莱斯大学，还是免费。哈罗尔是我心爱的大提琴家。当年在加州，借来他演奏的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全集，那个惊天动地，让我躺在床上热泪盈眶。我问一个专业大提琴手，你觉得他如何，他说确实好，比马友友深刻多了。可惜，哈罗尔的名气远不如马友友。

一直都不知道他竟然是眼前的莱斯大学的老师。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把时间记错了，早去了一小时，在外面闲逛一会后再去，队伍已经排起来了，眨眼间，队伍发育成转圈儿的长龙。“教师演奏会”在任何一个学校都不新鲜，可大家都心照不宣，这哪儿是普通的教师，这是世界级的大师啊。

简直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在美国我们慢慢学会这样的经验，涉及文化艺术，决非一分钱一分货，有时国际一流的货色很可能免费！跟哈罗尔合作的钢琴家帕特是生于加拿大，也非同小可，得过利兹钢琴比赛冠军。

曲目三首，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第一组曲，BWV1007，贝多芬奏鸣曲第四(C大调)，拉赫的G小调奏鸣曲。算是马马虎虎横穿古今。老头拎琴出来，年纪跟我想象的差不多，起码七十多岁——据说在某音乐节就演出了五十年，白发秃顶，神气朴拙，挺可亲的一个老爷子。

巴赫这套曲子我断断续续听了数年，现在当然感受很不一样了，尤其是忍不住用“管风琴思维”来听它。不管怎样都是好的，它的压抑和汹涌一样强烈。老头拉这曲子怎么也有五十多年了吧。偶有错音，但仍然好听得要死。哈罗尔没有“巴赫专家”的称号，但我想，所谓谁是什么专家，其实有时是听者在心理暗示下强加的帽子。一个拉贝多芬很好的人，拉巴赫怎么可能不好？同理，演奏巴赫很好的人，演奏莫扎特也不会坏。人尽管各有天性所倾，但苦心练习几十年，是很可能穿越气质藩篱的。

他演奏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的时候，简直用弓子在砸琴，高潮中的乐句像一阵阵短风，把房顶要掀起来。那是曾经让我落泪的音乐，因为它的力量冲破一般人情绪和想象的界限，用听觉把人引向幻境。而听者乐意接受这种鼓动，自己生出力量跟着幻觉跑，又是缘分之妙。当然，气势只是表面的感觉，大师多年的修炼，比如对细节和节奏感的精准把握、随心不逾矩的能力，才是张狂背后的坚强后盾。曲毕，大师的弓上弓毛飘扬。

可惜，我对大提琴毕竟懂得太少，只能听到个轮廓，不知有多少宝贵的细节悄然溜走。曲子拉了几十年，大师的感想就跟音乐一样有趣吧。

音乐会竟然还赠送CD和DVD，只是数量不多，只给排在最前面的二三十人，我没有抢到。也好，这样的幸福不敢要得太多，以免折寿呢。我在音乐上是真挚的追星族，每当大师在面前出现，我总是激动得难以言表，虽然从来没想到过让人签名留念。一向不觉得获得大师的照片或者签名是什么荣光，只是我作为一个接触乐器演奏的人，看到音乐在自己生命中的折射，自然就会好奇天才们的生命。这一切都是眼前的奇迹。

这两天休斯顿猛然转冷。我不喜欢冷天，但冷天里的音乐总是激起幻觉，好像音乐跟艳丽的雪光一起舞蹈。回家后我又找出卡萨尔斯拉的巴赫无伴奏组曲，准备重温甜蜜。



译介

又对了:约翰·斯图加特·密尔的激情(一)

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

翻译:陈丹丹(南京, Cheryl@live.cn)

对所有的事情总是看法正确实属不易。没人喜欢万事通,我们等着万事通出错的时候,好去指责他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知道。万事通其实远没有自满地陶醉于优越感中,而是要时时担心能否再对一次。很显然,没人比约翰·斯图加特·密尔更有本事,可以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如此多的事情都保持如此正确的观点。这位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兼无可匹敌的万事通成了很好的新传记《约翰·斯图加特·密尔:维多利亚火把》(John Stuart Mill: Victorian Firebrand)的主人公(英国记者理查德·里夫斯所著)。此书作为卖点的副标题其实并不恰当;火把是烧完就没了的,密尔可是热度稳定地烧了半个世纪,直到今天还保温良好——“维多利亚慢炖电磁炉”也许更接近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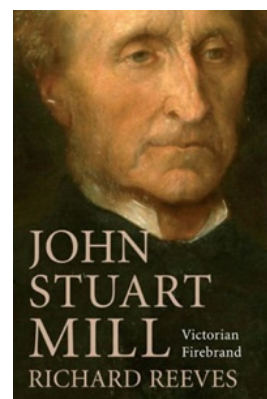
密尔相信男女完全平等(可不仅仅是女子学院),以及有一天女性能获得普选权和绝对的同等地位;也支持面向所有人的平等进程,废除奴隶制,工人阶级投票权,节育权(他十七岁时曾因为帮助穷人获取避孕措施而被捕),并认为人类所有种族都有相同的智能。为因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遭拘留的人获得法定诉讼程序的抗争也是由他领导的;他还主张开展阿拉伯语教学,以防止与潜在的本土激进分子疏远;反对掺杂了过多的系统性法国理论的英美自由主义——除了上述这些外,他还很明智地接纳了自由市场作为繁荣动力的想法,同时也希望市场的过度发展和不平等得到纠正。他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确的,甚至在思考什么是错误的时候:对于错误他心态开明,宽宏大量,所以能从托马斯·卡莱尔的反动政治观中看到其天才之处;也能把关于柯勒律治——上一代保守派的领军人物——的文章写成对一个观点全部错误但文笔很好的作家的激赏范文。密尔是宗教顽固派和迷信的敌人,宽容和自由思想的朋友,而在这两方面他都表现地恰到好处。(没有谁比密尔对拿撒勒人耶稣的伦理美德更有说服力的了。)

所有这些却给传记作家带来了麻烦。我们每转弯,都能看见密尔因为提前抵达而有那么点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对智识和真理的钦佩会很容易地转变为对拥有它们的人的怨恨;公正的亚里斯泰提斯(Aristides the Just)被驱逐出雅典,正是因为人们受够了他总被称为公正的亚里斯泰提斯。里夫斯这本有趣而人性化的传记的诸多优点之一就是 通过 向我们展现失去了理智和希望的密尔而给后者带来了新生,这可是赋予说教式伟人以新的生命的唯一办法。密尔只失去过一次理智和希望,这也就够了。他的故事发生在纯粹的理智和理性探索的阳光下,在夜里又被浪漫的烛光点亮——这光芒中有一点点爱情和足够的疯狂。

密尔有着十九世纪最奇怪的童年经历,这也是他死后发表的那本无可匹敌的回忆录的主题之一。他于1806年出生,父亲是使命感强烈的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密尔,母亲很消极被动,几乎没怎么看她出现过。密尔被选中参加一项教育实验,接受他父亲以及他父亲的导师,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填鸭式教育。实验的目标是培养出一个超级发达的头脑——被强制地灌输事实,如同不走运的鹅被灌输玉米一样。这个小孩头脑中的鹅肝酱后来被他满怀感激的国家吃下了肚;而小孩的生活,如同鹅的舒适程度一样,是次要的。拉丁语,希腊语,古代史,政治经济学……里夫斯写到,“密尔六岁的时候就写了本罗马史;七岁用古希腊文读柏拉图;八岁沉浸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到了十二岁,他基本上可以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了。

这份课程设计没给新诗和旧乐留什么空间,只有历史、数学、经济学、古典学,以及边沁式的格言:行动可以指向欢乐或痛苦,幸福或忧虑,正确的行动指向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严格执行这种说法,好似对伦理学机械式的戏仿,但它是不无道理的。边沁真正的成果是挤掉了启蒙言论中对于“权利”的虔诚。人们拥有权利并非因为这是上帝的恩赐;他们拥有权利因为权利是有用的。

密尔奇怪的教育经历成为十九世纪的噩梦之一;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小男儿》中就想象到,一个被野心勃勃的父亲塞满知识的小孩突然头脑断路而变成永久性神经衰弱。但密尔还是成长为注定要做的天才人物。他十七岁即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当时掌管印度的私有企业——并呆在伦敦的东印度总部三十五年之久,远程管理印度事务。不





错，他服务于英帝国主义，但他属于仁慈的那一类人。（后来，当政府试图缩减印度殖民地大学的阿拉伯语和梵语教学经费时，密尔曾力争维持现状，担心会失去与当地精英阶级的联系。

“不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他写道。）作为实足的工作狂，在兴奋的回忆录写作中闷热难当时，他会一件件褪去自己的衣服，不穿马甲和裤子而在凳子上严肃地工作，引来端庄整洁的同事们维多利亚式的惊奇观望。

对于密尔的思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二十岁之前就已新闻业流行作家的身份出现，全心投入到了报纸杂志职业写作之中。这个早期维多利亚景观的发展态势是与蓬勃的铁路运输业比肩的。密尔成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刊迄今为止水平最高的辩手。《威斯敏斯特评论》由边沁在 1823 年创办，与保守的《季度评论》、《爱丁堡评论》抗衡。“新闻业之于现代欧洲就如同政治演讲之于罗马和雅典，”年轻的密尔庄严宣称。其实前一个世纪就有不少伟人是

从赚钱的新闻业起家的（最有名的要数塞缪尔·约翰逊），之后在公众心目中升华为高贵的哲学家，而一开始就满腹哲思的密尔，却选择了为报纸杂志写作，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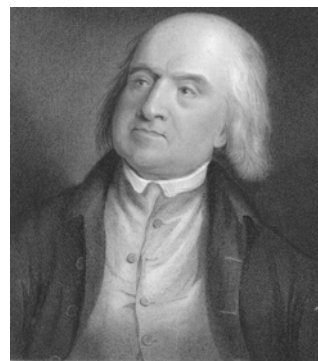
密尔在整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连续攻击了休谟的历史学说（哲学上激进的休谟在政治上其实很保守），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感伤民粹主义，英国宪法中错误的“制衡”观念（如果一个政府真能完美地“制衡”，那“机器就要停止运转”了），以及针对天主教的歧视。在所有这些攻击中，密尔仍然追随着他导师的思想，包括其冷淡的作风。“纯粹的推理机器——这个经常用来形容边沁主义者的词……用在我生命中的两三年中，也并非完全不合适，”密尔很久以后坦承。

正如我们所知，推理机器的失败率较高；硬盘驱动器早晚会停止响应的。密尔的也是如此：他于 1826 年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其回忆录中对这段为期两年的精神崩溃的描述堪称英文中最好的描写之一：“我没有在对他人的倾诉中寻得安慰。假如我可以爱一个人以至于向其吐露悲哀是一种必需，我就不可能陷入当时的困境了。”尽管他能够继续工作，却再也无法写作了。聪颖的天分告诉他，问题出在性格形成的某个阶段，某个没怎么注意到的地方。他于是求助于音乐的慰藉，并在一段时间内起了作用，直到他逐渐痴迷于这样的想法：总共只有这么几个音符，这么多个音符的组合，总有用完的时候，那所有的旋律不就耗尽了么？

拯救密尔的是诗歌。他开始阅读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特别是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作品，终于在 1830 年前痊愈，或者至少好多了，能看见了新的光了。当然，阅读诗歌没能改变他的性格：密尔仍是个谨慎、文雅而沉闷的角色。但是他的兴趣却有了转变：从那时起，成了传播艺术的福音派，比得上任何一个罗斯金式的唯美主义者。（“他绝对是个哲学家，但同时又读华兹华斯，”一位失望的功利主义友人抱怨到。）密尔经常访问意大利，周游教堂欣赏名画。他成了审美家——一个有责任感、系统化的审美家，但仍然是个审美家。

对诗歌、音乐和艺术的热爱也将密尔引向了保守主义思想。审美家总是右倾的，部分是因为最好的音乐和最好的建筑都是过去的产物，而“过去”也正是其伟大的原因之一。走进沙特乐大教堂（Chartres）的人会在一瞬间变成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凝视贝利尼或提香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不平等的社会能够早就超群的艺术作品。热爱旧的艺术便是崇尚旧的秩序。但密尔知道，即便新的、进步的艺术，也是想象和灵感的产物，和公平、透明的交易往来无关；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公平，平等，个人权利——都无法进入艺术的领域。假使密尔喜爱的莫扎特生活在有权选举国会议员、可以拿养老金、能就一般话题写读者来信的世界，他作为公民会又所获益，他的姐姐也会有机会发展一下作曲才华。不过，莫扎特的作品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艺术是古怪天才的成果，我们可以保护这样的天才，却无法用功利的理论来解释他们。

所以，到了 1834 年，经疯狂磨炼、艺术教育后的密尔（他也沉痛悼念了两年前边沁的过世，但也可以说边沁之死解放了密尔的思想）创办新刊《伦敦评论》时，他最想找的撰稿人不是功利主义者，而是伟大的苏格兰反动分子，散文诗人托马斯·卡莱尔（密尔和卡莱尔，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之间深刻的友谊可以作为一本书的好题材。）卡莱尔灵魂和想象的原创性令密尔深为钦佩；密尔对理性论证的深沉信念虽令卡莱尔不以为然，但后者也承认年轻的密尔的头脑更完美、精确。这份友谊甚至挺过了文艺史上最伤感的事件：密尔的女仆不小心把卡莱尔所著的《法国革命史》的唯一手稿当柴火烧了。（卡莱尔对此不是很气恼，大概是因为他像许多作家也一样，想让所写的书再“孵”一段时间，直到加入名为“出版”的简短情节剧之前。）在整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密尔和卡莱尔之间的互相让步—



一极度悲观的卡莱尔认为文明的表层下是原始的暴力，而密尔深信治愈原始疾病所需的正是更多的文明——成为英国思想的创意引擎之一。

密尔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起，从大陆哲学中吸取了不少在当时和在现在都被实际的盎格鲁—撒克逊同仁们视为江湖骗术的东西。他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处借来了“自我发展”这个术语，并视之（而不是功利主义式的愉悦）为生活的目标。对于后疯狂时代的密尔来说，美好的人生不是在功利的自动售货机前排队拿糖果，而是投入到世界中，创造最好的自己——去想的地方旅行，见识想看东西，说要说的话，唱自己的歌，听自己的诗。密尔虽然穿着灰色花呢套装，却是个浪漫主义者和伊壁鸠鲁信徒。他成熟的自由主义既是狭隘的历史学家所定义的自由主义——即自由行动导致好的结果，并反过来被证明合理的理论，也是我们普通人所谓的思想开明：对生活中所有愉快的事物都不存偏见，并慷慨地享受。

和每一个受享乐主义影响的英国人一样，密尔花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呆在法国。其实密尔从小就暗暗崇拜法国，后来的疾病和康复坚定了他公开亲法的决心。他在法国南部的教皇城阿维尼翁买了个小房子，这所房子成了他心目中的家，是晚年生活、写作、以及最后逝世的地方。英国人即便亲法，也会在法国人面前摆摆架子，密尔并不例外：“一有事情出错，法国人的习惯冲动就是说‘il faut de la patience’”——要保持耐心——“而英国人会说‘真可惜啊。’认为出错可惜的人会很很快得到结论——导致错误的罪恶能够也应当被制止；从长远上看，他们对创造更好的世界贡献最大。”1848年法国革命所扬起继而又破灭的希望之于密尔那一代人，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铁幕的倒掉、普金的登台一样：先是作为自由主义终究胜利的依据而振奋人心，接着却带来了压倒性的觉悟——原来它根本不是独裁和铁腕民族主义（在法国的体现是拿破仑三世）的对手。（这一法国经验深深刺伤了密尔，使他一度提议在理想的共和国中要给受教育的选民更多选票——拿破仑三世可是由一个农民国家选举出来的。）

尽管密尔对法国政治很失望，法国仍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地方。法国文明人性化的影响——“自由而亲切的大陆文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和了密尔干枯的确定性。成熟的密尔是个沉稳的思想家，但不是很系统化。他承认半真理和接近真理，以及“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的存在。“从生活最实际的角度讲，真理是如何协调、整合相反力量的问题，”他曾写到：“甚至进步，这个本该是往上追加的概念，多数情况下却只是用某个部分的、不完全的真理去取代另一个。”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维多利亚早期的英格兰，没有谁比激进的密尔受到的关注更多。我们只能艳羡他所拥有的观众，如果密尔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候选人演讲片段的时代，恐怕会被视作可怕的权威吧。但他不是一个格言家，他的文章篇幅颇长。那些句子摇晃、震撼，把人们引入沉思，如同大象一般优雅而有分量，往往也同样很占地方。他曾撰文为享乐主义哲学辩护，里面谈论的哲学要比享乐主义更多“他们所指的幸福并不是充满狂喜的生活；而是由这样的瞬间组成：很少的、转瞬即逝的痛苦，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愉悦，绝对的压倒被动的主动性，以及最基本的一点——不对生活抱有它所无法给与的希望。”换句话说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不过密尔的纸页间可没有花朵。不管是什么样的题目，密尔总是检查地基、清除灌木、用稻草造一件房子给你看它有多脆弱，然后一把火烧掉，再在原地重造个砖房，谅你也打不到它。砖房不是很雅致、精巧、迷人（起码维多利亚时代的砖房通常如此），但却很牢靠。阅读密尔不会令人像看罗斯金、卡莱尔那般心醉神迷，但你能在其中得到认真生活的启发。

密尔厌恶教条，包括自己的教条——这使得他偶尔成为教条主义者的朋友。有人认为大自然中能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密尔没说这是胡话，却质问如果这是真的会意味着什么，然后得出推论，这个创造者只能是有限、笨拙、心肠好而健忘的，每天还必需和另一个力量作斗争：“一个拥有伟大而有限力量的存在……他希望自己的造物能获得幸福，并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但很难说这是他制造宇宙的唯一目的，似乎还有其他的行为动机吸引着他更多的注意力。”自然神学如果细加考虑，显示的不是伟大的钟表匠或无所不知的主神，而是个心不在焉的地主，艾姆公爵式（Lord Emsworth，英国作家 P. G. Wodehouse 笔下的人物——译注）的角色，虽然会为年轻的恋人们牵线搭桥，但更在意是他自己养的猪。

但密尔这么说是认真的：仔细地考虑上帝存在的论据，就会把人引至这样的结论。认真是密尔最关键的东西，频繁往来于伦敦和阿维尼翁、登山、管理印度、参观教堂的他，总是如此认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方委任的牙买加总督以骇人听闻的手段镇压了当地的起义——受指控的人在做样子的审判后遭受折磨，很多还被吊死——密尔在英国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自任主席，以谋杀而非管理不善为罪名审判牙买加总督。（为这位总督辩论的委员会成员包括狄更斯和卡莱尔。）当密尔说如果其他的人没有相同的权利，他自己的权利也无用时，他也是认真的。在苏格兰人卡莱尔的种族主义令坚定的废奴支持者密尔终于无法忍受时，他俩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

Richard Reeves : *John Stuart Mill: Victorian Firebrand*, Atlantic Books (8 Nov 2007)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 [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 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欢迎订阅,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 敬请来信告知。